

俞前先生 雅鑒

昆山莊吉於蘇州沧浪区政府

二〇〇四年五月廿日

序 一

《顾亭林传略》作者庄吉，是个年青人。几年前我到昆山去，与他见过面。最近他送来了这本书的书稿，要我写序。我感到惊讶：一个年青人在基层工作，还坚持研究，坚持写作，真不容易！在他的这种精神感动下，我欣然接受了。

作者用翔实的史料，简朴的文笔，把顾炎武的一生大概介绍给读者，使更多的人知道顾亭林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从而学习他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学习他的治学精神和远大抱负。这是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添砖加瓦，是可喜可贺的事。

顾亭林生于望族，嗣母的启蒙教育，蠡源公授学，幼年就受到良好教育。但又生逢乱世，一生坎坷。在家乡投身江南抗清斗争，参加昆山保卫战。失败后侨居南京经商，足迹遍及江淮一带。后在山东种地、山西垦荒。虽经营有

成，但又生祸端。因田产纠纷与奴变，被仇家囚禁、遭刺客袭击；又因济南“逆诗”案受人诬陷，冤狱七个月。更多年月是文化苦旅，行万里路，破万卷书，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丰富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的辉煌成就。

顾亭林积极投身抗清斗争，拒绝征招，拒修明史，坚持不与清王朝合作，坚定地与恶势力作斗争，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他的爱国精神，是把忠于祖国和忠于人民结合在一起的，而且以忠于人民为重。他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又说，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还说，后人不忘其先民，忠也。他的广为人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成为后人长期起作用的精神财富。

顾亭林生性好读书，十一岁便开始读《资治通鉴》。一生读的书，不下三万卷。他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既重视多方面的知识积累，又重视自己的操守；既博览群书，又认真向实际学习。他经世致用，把国家天下的事都当学问去切实研究，凡不涉及当世之务的不予考虑。正是由于有了研究学问的明确目标和正确方法，因而也就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他的著作有六十多种五百余卷，内容包括经学、历史、地理、天文、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宗教、法律、金石、音韵、方志等，主要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主要成果是对中国长期封建制度的批判，以及带有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的治国安邦方案的设计。由

于学术成就范围广博，因而以“清学开山”、“清代朴学鼻祖”著称。说顾亭林是学问渊博的大学问家、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是当之无愧的。

顾亭林传记著作，已出版好几部，有的还是大家所作。这本书系非专业年青人所写，难免有偏颇之处。好在这是部传略，文字不长，通俗易懂，作为爱国主义教材，值得推荐。

薛金鳌

二〇〇三年十月八日

序 二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顾亭林是一位杰出的人物。

顾亭林身处明清交替之际，不仅一生不仕二朝，而且无一日不读书，无一日不写作，他不只是文学家、思想家，更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此外，还有军事和音韵专著，农耕商务也有所接触，终竟成为“通儒”，一代大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地存肝胆，江山阅鬓华”；“永言矢一心，不变同山河”。这些脍炙人口的名言名句，足可说明顾亭林先生的胸襟与品德。

对于顾亭林，我觉得至少有两个缺憾：一是至今没有出版他的全集（那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二是，至今没有一个昆山人认真地写过关于亭林先生的学术性专著。去年二月，偶然的遇见了本书的作者，又偶然地说到了顾亭林，知道他对此颇有研究，就鼓励他写；今年春，得知联合国

世界文化遗产大会要在苏州召开，于是又希望他在3月底拿出初稿来——

真就拿出来了！而且一天不差。更可贵的是，作者对浩如烟海的资料多有涉猎，了解和把握的程度超过了我的期望值。所以，尽管只是一本“传略”，但对亭林先生一生的轨迹脉络梳理得一清二楚，使我这个门外汉读过也大体上清楚亭林先生的来龙去脉了。

这是昆山人自己研究顾亭林的有学术价值的一本书。

作者重点写了嗣母和蠡源公，正是他们，决定并影响了亭林先生一生的所作所为。同时也浓墨写亭林先生所经历的两次灾难：家奴的背叛和济南的文字狱。当然，顾亭林的北上远游、广交天下学者，如何成为一代“儒宗”、一位爱国志士，更是作者的笔力所在。而对于“归奇顾怪”一说，不只状“奇”写“怪”，还突出地写他们的患难之交，写这他们相敬、相重、相扶的友谊，两个文化人的形象跃然纸上。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父亲是个做学问的人，决非“以浮名苟得为务”之辈。就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乃父反复叮嘱：一，这是做学问，不是传奇演义，必须有根有据有出处；二，如果用了别人的研究成果，一定要加以说明。

正是在这样的家学背景下，使本书作者有一个科学的研究视角。对于顾亭林，作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他认为顾亭林所言“天下兴亡”一语是超时代的，哪一个

时代的人都可用以激励民众；所谓“经世致用”，实际上就是要面对现实，“与时俱进”；再如，“博学于文”的“文”，是文理之文，引伸为事物的条理；“行己有耻”，特指读书人的行为约束，读书人的无耻是国耻。等等。

所谓“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是亭林先生的治学做人的准则，也是研究亭林先生所必须有的态度。作者早在苏州大学就读时，就积累了许多资料，并且在他父亲的影响和帮助下，始终没有放弃对昆山先贤们的学术研究，即便在十分繁忙的经济工作之余，也从没舍得丢开他心爱的学业。我们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对顾亭林对与顾亭林同时代的人都十分熟悉，所以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须知这样的书不是朝夕之功或卖弄些小聪明就能写出来的。没有下过真功夫，没有长期的阅读和钻研，是写不成的，就只能敷衍或竟去“克隆”（剽窃的时髦语）。

在下客居昆山30多年，说起来还是个文化人，也写过那么一些书，可是，对亭林先生知之极少。在本书作者面前，只觉后生可畏，又自汗颜不已——在交谈中我还得知，作者对归有光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就接过话说：昆山历史上有四个文化名人（顾亭林、归震川、朱柏庐和顾阿瑛），给他们每个人写一本有学术价值的书，如何？

杨守松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

目
录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第一节	可爱的家乡	1
第二节	江东望族	4
第三节	亭林字号	7
第四节	嗣母启蒙	10
第五节	蠡源公授学	14
第六节	“归奇顾怪”传美名	19
第七节	屡试科举	23

第二章 国破家亡

第一节	明朝覆灭	27
-----	------	----

第二节	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	31
第三节	昆山保卫战	33
第四节	国难与家仇	37
第五节	嗣母遗训	41
第六节	流转吴会间	44
第七节	侨居钟山	48
第八节	田产纠纷与奴变之祸	52

第三章 文化苦旅

第一节	浩然北上	56
第二节	结交天下志士	59
第三节	经营与垦荒	65
第四节	济南下狱	70
第五节	行万里路，破万卷书	75
第六节	虚怀若谷，广师学友	79
第七节	拒绝清廷征召	85
第八节	晚年卜居华阴	88

第四章 一代儒宗

第一节	三大思想家的历史命运	92
第二节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95

第三节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98
第四节	经世之学，当世之务	102
第五节	采铜于山，著作宏富	110
第六节	开三百年学术风气	116

第五章 万世敬仰

第一节	亭林墓地	123
第二节	顾亭林祠堂	126
第三节	顾炎武纪念馆	129
第四节	遗址、遗迹	131
第五节	遗物、手稿	133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每个人都有值得回忆的青少年时代，读者对鲁迅先生《朝花夕拾》中《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一些脍炙人口的文章一定不会陌生。以下将展示明末清初伟大爱国主义思想家顾亭林的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或许您会从中得到一点新的启示。

第一节 可爱的家乡

人人都说江南好，在“鱼米之乡”的江南名城昆山市区东南15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千年古镇——千灯镇，这是江南有名的大集镇，这里物产丰富，商贾往来，人文荟萃，素有“金千灯”的美誉，同时也被人们称为“亭林故里”。

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发现，在现千灯镇政府东侧的少卿山，保存了一个距今五千多年的古文化遗址。从该遗址发掘出来了一批精美的新石器时代后期良渚文化玉器。这一发现给千年古镇带来了一份意外的惊喜，谁也没有想到在这里居然蕴藏着如此灿烂的史前文明，一下子把古镇的历史上推了好几千年。这简直就是一个谜！人们在猜测这里会不会是一个部落？甚至是一个小邦国？那么他们的首领是谁？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又是怎样生产的？如何生息繁衍？没有人能够确切的回答。而且至今让考古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些“断发纹身”的土著居民们，是如何加工出那些精美绝伦的玉器？太多的问题，太多的迷，为这座古镇又增添了几多神秘。

说起千灯的地名，常有人望文生义，以为镇上有一千盏灯。其实千灯原来写做“千墩”，或者“茜墩”。先秦时期，这儿是吴国的边陲，一旦发生战事，消息要报到吴国都城，怎么办得到呢？当时的人就是通过烽火台，白天点烟，晚上点火来报信。据说从国都苏州开始，沿吴淞江一共筑了九百九十九座烽火台，这里是第一千座，所以也就有了“千墩”之名。

千灯镇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叫“秦峰塔”，传说秦始皇东巡曾经亲自临幸此地，因此古代千灯也有“秦峰”的雅称。该塔属于波若寺，始建于南朝梁天监二年（公元503年），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此塔几

经兴废，到北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寺庙更名为延福教禅寺，重建了佛塔，当时塔名为释迦佛塔。塔为方形七级，砖身木檐楼阁式。塔身纤丽，十几里以外人们就能遥遥望见她形态绰约的身影，因此当地人也称之为“美人塔”。明朝万历年间，地方上有个名宦叫顾绍芳（顾亭林的本生祖父）的，曾出资加固此塔，就是在原塔身的外立面用砖包砌一层，通过这番加固才使此塔保存至今。前些年，政府专门拨款对该塔进行了全面修复。现在游人已经可以从塔身内的扶梯逐级登上塔顶，临风远眺了。登临此塔，放眼四周，北可见玉峰山山势起伏郁郁葱葱，南可望淀山湖烟波淼淼，东可见尚书浦碧浪滚滚，西可俯良田千顷炊烟袅袅，古镇风光尽收眼底。

塔的北侧保存着大雄宝殿的殿基，随地堆放着一些巨大的青石条，还有两个外方内圆的石鼓墩，《淞南志》上记载有“碧波涌础”的传说，大概就是指它，足见当时这座延福寺的高大雄伟。不难想象每逢初一、十五，四乡八村的善男信女们都会聚拢到这里来朝拜敬香，香火自然盛极一时。殿基东西两边各有一棵高大的古银杏，虽经千百年雨雪风霜，依然枝繁叶茂，生机勃发。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作者曾亲眼看到当地文化站的工作人员和曲艺爱好者经常在古树底下说拉弹唱，颇有一番情趣。后面有一个较小的殿宇，近几年已经有了一点香火。据说宗教界准备把这里重新恢复起来，再展千年古刹的雄风。

塔的东侧有一片广场，原来是千灯镇上的露天集贸市场，这是古镇千百年来一直沿用至今的中心市场，过去赶集的人们都会带一些农产品或手工产品到这儿设摊叫卖，又买小菜或采购一些日常用品回家。从广场东侧，朝北朝南有一条蜿蜒达3华里的石板路，贯穿全镇，就是著名的北大街和南大街。踏上这条名闻遐迩的石板长街，便有“玉石千条肩并肩，甘化云梯上九天”的感觉。有心人点过，共有2090块之多。石板街两侧临街店面的楼宇，挑檐而出，形成江南古镇“足踩青石板，头顶一线天”的独特景观。谁也不知道数百年来有多少人在这条街上匆匆地走过，又在这条大街上发生过几多往事……

古镇、古塔、古银杏和那长长的石板古街经历了千百年岁月沧桑，见证着这里的历史变迁，讲述着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而最动人心魄的就是——顾亭林的故事。

第二节 江东望族

先说说顾氏，江南顾氏相传是大禹的嫡裔，越王勾践的后代。勾践的七世孙闾君摇，封地东甌，摇别封其子为顾余侯，从此就有了“顾”这个姓。

作为江东四大望族之一，顾氏早在三国时代就世居吴郡（即苏州）一带。五代时，顾氏祖上从吴郡迁徙到滁州。

南宋时，有一个叫顾庆的人，又从滁州迁到海门姚刘沙的地方，即现在的上海崇明岛。宋末元初，顾庆的次子伯善，又迁居昆山县花蒲保，现属太仓市双凤镇。后来才搬到千灯镇定居下来。

从顾庆开始算起，历经十二代，到明朝正德年间，也就是顾亭林的高祖一辈，开始入仕做官，顾家从此兴旺起来。顾亭林的高祖、曾祖、祖父三代人里，一共出了四名进士，且都当了大官。

顾溱，字梁卿，号小泾。正德辛巳（公元1521年）进士，官至南京工科给事中、广东按察司佥事。

顾济，亭林高祖，顾溱的弟弟。字舟卿，号思轩，正德丁丑（公元1517年）进士，历官行人、刑科给事中，赠中宪大夫、江西饶州府知府。他的宅第就在昆山千灯尚书浦西蒋泾（今千灯镇南顾氏南宅）。

亭林的曾祖叫顾章志，是顾济的次子。字行之，号观海。嘉靖癸丑（公元1553年）进士。历官行人、刑部员外郎中，江西饶州府知府，湖广、广西按察司副使，贵州布政司，山东按察司按察，南京光禄寺卿，应天府尹，最后做到南京兵部右侍郎。死在任上，赠都察院右都御史，赐葬昆山县尚书浦西鸣字圩（今千灯镇南，原千灯中学内），亭林《寄弟纾及友人江南》诗中提到：“吾家有赐莹，近在尚书浦。”就是指曾祖的墓地。顾章志为人正直，刚入朝为官，当时严嵩父子权倾朝野，其他人争相趋之，而顾

章志不愿意去巴结他们。后来他出任饶州知府，饶州地方民风强悍而且好斗，其中有一些官吏还暗中挑唆，顾章志通过明查暗访，依法惩办那些不良官吏。晚年曾上疏减少进奉马船的数量，得到皇帝认可，使军民得到了实惠。顾章志被县志列为“名宦”。

亭林的本生祖名叫顾绍芳，是顾章志的长子。字实甫，号学海。万历丁丑（公元1577年）进士。历官翰林院检讨、经筵日讲官、左青坊左赞善兼翰林院编修。因病告归，四十七岁卒。顾绍芳生性恬静，也比较耿直，他认为人的一生总有荣辱得失，只有自己把握得正，不能随便依傍别人。他为官清廉，曾经开办义学教化族人，还用自己家的余粮帮助贫困家庭，口碑极好。

亭林的嗣祖是顾章志的次子——顾绍芾。绍芾字德父，号蠡源。国子监生。他早年跟随父亲顾章志经历了江西、广西、山东、南京等地，熟悉各地的风土，所以眼界极宽，虽然他一直没有机会出仕，但是他十分留心政局时事，是当地有名的乡绅。他的文才极好，诗仿李白、李贺，书法曾经得到名家董其昌的赏识，亭林认为他的书法接近唐代人的风格。

顾绍芳的次子顾同应，是亭林的本生父。同应字仲从。同应聪明好学，精于举子业，工诗文，为县稟生。万历乙卯、戊午两次考中乡试副榜，恩荫入国子监。四十二岁去世。顾同应性格豁达大度，尽管自己家里并不富裕，仍然

乐善好施。他去世的那天，亲戚朋友全都来哭吊他，千灯镇上的店铺悉数关门，几乎如同罢市。顾同应著有《药房集》、《秋啸集》等诗集，《明诗综》评论：“仲从诗，词淡意达，有白云自出、山泉冷然之致。”顾同应娶何氏为妻，顾亭林是他们俩的第二个儿子。亭林出生不久，就过继到了隔房兄弟顾同吉的家里做了婶母王氏的嗣子。

顾同吉是顾绍芾的独生儿子，十八岁因病夭亡了，所聘王氏未婚守节，膝下无儿。后来由两家老人作主，把襁褓之中顾亭林过继给王氏抚养，以接香烟。那年嗣祖顾绍芾五十一岁，嗣母王氏二十八岁。

第三节 亭林字号

顾亭林（公元1613—1682年），初名绛。顾亭林那一辈人的名字都用绞丝偏旁，他的哥哥名缙，三个弟弟分别名纆、纆、绳。读书的时候亭林曾经更名“继坤”，后仍改为绛。明朝灭亡后，亭林正式改名为“炎武”，也写成“炎午”；此外，他还使用过“圭年”这个名。在他流亡的一段时间里还曾改姓换名为“蒋山佣”。

古人除了姓、名，还有表字。亭林的字在复社的登记名单上为“顾绛，字忠清”。入清后，他就把表字改为“宁人”，朋友们习惯上都称呼他“顾宁人”。

那么“亭林”这个号又是怎么来的呢？原来，顾氏家族在南朝时出过一位大人物，名叫顾野王，江南顾氏大多以他为自己的先祖。亭林曾经和同族兄弟祭扫过顾野王墓，传说顾野王在华亭、海盐（今上海金山）一带有大片土地，其中有个很大的私家园林，园中有湖，叫亭林湖，人们就把那个地方叫“顾亭林”。顾炎武非常敬慕这位先祖，所以自号“亭林”，后来的学者都尊称他为“亭林先生”。

作为顾炎武的家乡人，作者发现昆山人对于这位尊敬的乡先贤习惯上都喜欢称他“亭林先生”，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一条路和一个公园定名为“亭林”。如今昆山除了有条路叫“亭林路”，公园叫“亭林公园”之外，还有社区叫“亭林街道”，学校叫“亭林中学”，连企业商店的名字，甚至产品如香烟、啤酒的商标，都以“亭林”为名。这样感觉比较亲切自然，也比较顺口响亮，所以本书就以《顾亭林传略》为书名。

此外，作者有必要提及一事，即在平时与本地人或来昆山旅游的朋友交流的时候，发现常常有人把“顾亭林”和“顾鼎臣”混淆起来。这里顺便作一说明：

顾鼎臣出生在明朝中叶，昆山人氏。小时候生天花，满脸麻子，人称“顾大麻子”。年纪很轻就中了状元，昆山人人都相信他是文曲星下凡，传说城隍老爷对他也只好眼开眼闭。后来他当了少保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相当于丞相）。由于他为人恭谨，得到了皇帝的赏识。有一

次皇帝南巡，就命他辅佐太子留守京师，据说有八十三天。晚年顾鼎臣告老还乡，他看到昆山的城池年久失修，而且是用土筑的，不坚固，那时倭寇骚扰沿海，很不太平，就向皇帝请求重建昆山城，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特许建造砖石新城。这个坚固的新城池在倭寇侵犯的时候，起到了保一方平安的作用，所以昆山人民对顾鼎臣十分感激，建祠崇功，在民间一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传说。

顾鼎臣和顾亭林，同是顾姓，一个世居县城，一个世居千灯，他们是同姓而不同家族也不同支系。亭林有个朋友叫顾咸正，是顾鼎臣的曾孙，比亭林年长一辈，两人一起参与抗清，亭林在《哭顾推官》诗中提起他们两家“世远亡谱系”，到他们一辈才“始结同盟契”，亭林敬重顾咸正，称之为族父。其实他们之间只能讲是“五百年前同一家”，此其一。其二，他们不是同一时代的人，顾鼎臣生活在明朝中叶，大概与亭林的高祖顾济是同一时代人；而亭林生活在明末清初，两者相差将近一百三四十一年。其三，顾鼎臣是明朝重臣，身居要职，曾经当过皇帝的老师；而亭林一生没有正式入仕，虽然南明小朝廷曾经两度授予他兵部司务、职方等小官职，而事实上，由于战乱，他并没有正式就任，只能说是一介布衣。

第四节 嗣母启蒙

亭林的嗣母王氏（公元1586—1645年），她是明辽东行太仆寺少卿王宇的孙女，父亲是太学生王述。

王氏出生在诗礼传家的大户人家，自小有大志，知书达礼，与一般闺阁千金不太一样。她父亲王述为她办理嫁妆，嫁妆鲜艳华丽，王氏看到后就对母亲说：“女儿的为人父母亲都知道，生平最仰慕古代的贤女子少君、孟光。为什么父母亲要办这么多俗气的嫁妆呢？”父亲王述听说后，便将华丽的衣裳调换成朴素的衣裳。

王氏十七岁那年，未婚夫顾同吉得了急病去世。噩耗传来，王家父母考虑到女儿的终身，本不打算让她知道，谁料到王氏已经听到了这一消息。她脱去了姑娘时穿的罗裙，换上了一身素服，一连几天不吃饭，家里人都劝她吃点东西，她就对父母亲说：“女儿打算去祭奠一下顾郎，等回来再吃吧。”父母亲一开始十分为难，但也知道女儿的心思，要违拗她是不可能的，就准备了一些祭奠的物品，由王述陪着一起到了顾家。

顾家这边的公公婆婆听说未过门的媳妇要来祭奠亡儿，十分悲伤，他们立即叫人洒扫庭院，以迎娶儿媳的礼数来迎接她。王氏向同吉的灵柩跪拜，抽抽噎噎，没有哭出声。祭奠完毕之后，到内堂下拜，请求公婆收留她。并

对父亲说：“替我拜谢母亲，女儿不回去了。”一听此言，父亲王述顿时板起面孔不再作声。公公顾绍芾是知晓大义的人，他哭着对王氏说：“感谢你心里还牵挂着我的儿子，不过你们还没有正式成夫妻，怎么能让你这样就到我家呢？”王氏说：“我听说《礼》上讲，为人要讲信用，这是我作为一个妇道人家的品德。从前已经答应了这门婚事，我就是顾家的人了，现在能让我到哪里去呢？”婆婆听了这话，擦着眼泪说，“你这孩子实在好过头了，哪能让我儿子的死连累你新妇呢？”王氏听到婆婆称她“新妇”，眼泪夺眶而出，扑簌簌掉下来。就这样，王氏算是入了顾家。

于是王氏每天早晚跪在亡夫的灵柩前祭奠，有空的时候就照顾婆婆的饮食起居。自己则住在旁边的一间厢房里。娘家的亲戚们派了下人去看她，她都闭门谢客；曾经有一个尼姑请求相见，她不同意，说：“我是决不接待陌生人的。”从此，她经常带着婢女纺纱织布，或是操作女红。有时派人到娘家问问父母身体是否安康。

有一次，公公顾绍芾去南京办事，不料婆婆李氏得了重病，王氏日夜照顾。可是不见病情转好，王氏心中十分焦急，听说民间有一个说法，用手指作药引子管用（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她忍着剧痛砍下了自己的一节手指。就把那节断指和在汤药里一起熬，让婆婆服用了。这件事谁也没有知道。那天给婆婆进药的时候，李氏觉得她脸色不对，强打精神问王氏：“媳妇你怎么憔悴得这么厉害？是

不是休息得太少了？”王氏说不要紧没事过两天就会好的。说也奇怪，用完药之后，李氏的病竟然奇迹般的痊愈了。婆婆李氏就对身边的女仆说：“我以前一直担心儿子死了以后没有人照顾，现在有了媳妇，赛过儿子活在世上。”一天，李氏靠在床头想拉王氏的手，王氏缩回手不肯露出手指。李氏觉察有什么不对劲，反复追问，王氏才把断指的事说了出来。而家里所有女婢佣人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回事，她们听说之后都十分惊讶，有的感动得掉下了眼泪。王氏还让她们不要对别人说。后来，这桩事情被亲戚私底下打听到了，于是王氏“断指疗姑”的事迹很快传了出去，成为乡里孝敬长辈的一桩美谈。

光阴似箭，一转眼王氏已经服侍公婆十二载了。全家商量为顾同吉立一个嗣子，以续香烟。这个嗣子就是刚出世的顾亭林。

两年以后，昆山知县陈祖苞听说了王氏未婚守节、断指疗姑的事，肃然起敬，赶到顾家登门拜访。公元1634年，巡按御史祁彪佳表彰王氏。之后，巡按御史王一鶚上书奏请朝廷，得到了朝廷的许可，立石牌坊表彰。消息不胫而走，轰动了家乡，不管是祖父蠡源公的老朋友和社会名流，还是亭林一辈的有志青年与要好同学，无不牵着羊、捧着美酒前来祝贺。祖孙三代、母子二人更是欢欣鼓舞，其乐融融。

王氏是一个勤劳又好学的人。起初，王氏只是协助婆

婆操持家务，婆婆过世以后，全部由她料理家务，管理得井井有条。她名下有陪嫁到顾家的五十亩水田，每年的收成，她都全部分给顾家亲戚，自己从来不私藏一文。

在亭林童年的记忆里，嗣母王氏是这样生活的：白天纺纱织布，晚上还要读书，一直要读到二更天才休息。她最欢喜读的书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另外还有本朝政纪等书籍。在亭林六岁的时候，王氏就在闺中亲自教他读《大学》，作为他童年蒙学的第一部书，《大学》很短，主要是教人树立家族、国家和社会的概念，后来亭林一生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与王氏蒙学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到亭林十几岁的时候，王氏还给他讲运筹帷幄的刘基、刚正不阿的方孝孺、保卫京城的于谦等明朝大忠臣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深深地扎根于亭林的脑海之中，成为他终身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由此可见，在嗣母王氏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古代的道德标准，即一个“孝”字和一个“贞”字，她孝敬公婆，日夜服侍在公婆身边；立嗣以后，全部心血倾注在亭林身上，不但自己刻苦学习，而且注重对亭林的启蒙教育；她诚实守信，忠贞于自己未婚的亡夫；后面我们还要讲到，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她以一个六旬老妪，绝食而亡，舍身取义，这是何等崇高的民族节气！在她的身教言传影响下，顾亭林从小就树立了优良的品德和高尚的人格。

第五节 蠡源公授学

作为江东望族，顾氏家族世世代代都是读书人。亭林在《钞书自序》中说得明白：“炎武之先家海上，世为儒。”到高祖顾济的时候，他们家里开始有了一大批藏书，大概有书六、七千卷。后来倭寇犯江东各州县，一路上烧杀抢掠，千灯镇也没能幸免，顾家的老宅子连同高祖收藏的数千卷书籍全部被倭寇焚毁。

在亭林的眼里，曾祖顾章志是顾氏家族中兴的重要人物，他为官清正，酷爱读书。于是，慢慢的家中藏书又多了起来，只是所收藏的版本较高祖稍差了一点。顾章志自己也讲：“我所收藏的书，只求书的内容，至于书的版本、装帧是否考究，不是我所关心的。”

曾祖的藏书后来分为四份，分别给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侄子，亭林的嗣祖顾绍芾（蠡源公）得到了其中的一份。顾绍芾也特别喜欢读书，几十年中他不断地增加自己的藏书，到亭林过继给王氏的时候，他的藏书也大约有了五、六千卷。这些书籍全部收藏在他家的读书楼——“库楼”之中。良好的家学传统，反复的积累收藏，形成了一个知识的宝库，并养成了读书的良好习惯，这为亭林以后的读书、抄书、著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从顾亭林懂事开始，明末社会越来越动荡不安，各种

矛盾趋于激化。

首先是民族矛盾上升。公元1616年，在我国东三省的“白山黑水”之间，崛起了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女真，其中建州女真部的首领努尔哈赤正式建国，称“后金”。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大举进犯明朝边关重镇抚顺，烧毁了抚顺城，把城中人畜等一应物资全部席卷而去。第二年，明朝四路出师反击，中路军在萨尔浒遇金兵埋伏，全军覆灭；其他两路也被金兵击退。顾亭林回忆童年时代，“自臣母授《大学》之日，而东方兵起，明年三月，覆军杀将”，说的就是这件事。公元1622年，双方在广宁展开激战，明军又一次失败。同一年荷兰殖民主义者入侵澳门，自此，边关烽火不断。为了平定战事，中央政府先后向百姓增派“辽饷”三次，共征白银五百二十万两。以后又不断加派了各种名目的赋税，农民负担进一步加重。

其次是阶级矛盾。明末，土地集中的状况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地主阶级土地兼并严重泛滥。据顾亭林考察，“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农民再也无法承受大地主的盘剥，公元1616年在江南发生了松江、青浦等地万余民众，聚众抄华亭大地主董其昌家事件，人们不仅抄没了董家的不义之财，还烧毁了他家的房屋。

第三，是城市民众的抗税斗争。一些城市居民反矿监、税监斗争此起彼伏。比如公元1601年在苏州爆发了以昆山人葛成为首的纺织工人反对税监敲诈勒索的斗争，打死

了太监孙隆的爪牙二人，又火烧了豪富皂隶等十家住宅，孙隆吓得连夜逃走。

此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东林党人，掀起了反对以大太监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专权的斗争，结果东林党人大多被害。面对阉党的大肆搜捕，苏州民众极为愤慨，数万人聚众群殴锦衣卫，当场击毙一人。为了保护苏州百姓不受镇压，周文元等五人挺身而出，慷慨就义。后来复社领袖张溥，撰写了著名的《五人墓碑记》，纪念这五位英雄。

嗣祖蠡源公少年时期就跟随父亲顾章志周游各地，阅历非常丰富，熟谙明末三朝政事。晚年虽说他足不出户，但是对国家大事尤为关心，对苏州一带所发生的事情了解得更是一清二楚。公元1622年，发生徐鸿儒领导的山东白莲教起义，又听说后金攻战沈阳。这些消息，使得他日夜坐卧不宁，心情十分沉重，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有一天，他指庭院中枯黄的草根，一字一顿地对亭林说：“今后你们那一辈能吃得上这种东西，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了！”听了这话，年仅十岁的亭林半信半疑，他还不太明白蠡源公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但是看到爷爷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点了点头。从此蠡源公决定教亭林读古代兵家孙子、吴子等人的书，以及《左传》、《国语》、《史记》等历史书籍。顾亭林一生从事史学方面研究，就从那时开始。

第二年，亭林十一岁，蠡源公开始教亭林读《资治通鉴》。为什么要让亭林读《资治通鉴》原本，而不读当时比较流行的朱熹编的《通鉴纲目》呢？蠡源公说：“现在大多数人都只学《纲目》，因为图省力，又快，我不这样认为。其实篡改古人的著作，标榜成自己的作品，是最要不得的。以前班固改《史记》，必然不如《史记》；宋祁改《旧唐书》，肯定不像《旧唐书》；朱熹改《资治通鉴》，也一定不及《资治通鉴》。至于现代人的作品几乎辅天盖地，绝大多数的书属于抄袭剽窃性质。可以这样比喻，拿明代人一百本书跟宋代人一本书来比较，都比不上宋代人的著作来得有价值。”顾绍芾是站在史学的角度来分析的，特别是朱熹改编《资治通鉴》，打破了原书的历史脉络，目的想借用历史书来宣扬他的理学主张，存在以偏概全的毛病，比原书差远了。

亭林十四岁读完《资治通鉴》后，蠡源公就让他读《邸报》。《邸报》是明代官方的公报，刚开始是靠各级抄写流传，到了崇祯年间才有刻版的印刷品。蠡源公十分喜欢这份文献资料，每次阅读《邸报》，都要用小楷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并且装订成册，以备查考翻阅。到他七十多岁的十多年里，蠡源公已经摘录整理了大量明代历史资料，一共装订成二十五大本。亭林看到祖父那样专心抄摘，问爷爷为什么不自己著书立说？蠡源公对他说：“著书不如抄书。现在读书人的学问不如古人深厚，抄书可以吸取和

整理前人的思想学术成果，当知识丰富积累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你们年轻人要努力，要从认真读书、抄书做起。”这种对著书立说的严肃态度，一直影响了亭林以后的学术研究，后来亭林根据《邸报》和蠡源公积累的资料，编写了《明季实录》、《皇明修文备史》等著作。

所谓“旁观者清”，蠡源公一生没有卷入过任何党系的争斗，但对明末党系纷争的情况，了如指掌，其中的是非曲折也是心知肚明，他还经常就《邸报》上记载的时势与亭林探讨。成年以后，亭林对明末士人的学风深恶痛绝，认为晚明的腐朽不仅表现在政治的腐朽，也表现在学风文风的败坏。亭林在《与友人论门人书》中说：“今之为禄利者，其无藉于经术也审矣。穷年所习，不过应试之文，而问以本经，犹茫然不知为何语。盖举唐以来帖括之浅而又废之，其无意于学也，传之非一世矣。矧纳贖之例行，而目不识字者，可为郡邑博士；惟贫者而不能徒业者，百人之中尚有一二读书，而又皆躁竞之徒，欲速成以名于世。语之以五经则不愿学，语之以白沙、阳明之语录则欣然矣。以其袭而取之易也。”当时所谓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空谈所谓明心见性的理学，亭林对于这种不切实读书、空谈理学的颓靡学风的批判，是与蠡源公一脉相承的。

第六节 “归奇顾怪”传美名

顾亭林十四岁，以全县第二十二名的成绩，被录取为县学诸生，俗称“秀才”。十七岁那年，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加入了当时著名的社团——复社。

明末清初，江南读书人集社的风气很盛。复社为首诸君子出于提倡道德、气节的目的结社。举子们通过集社活动，建立横向交流渠道。一些志趣相投的青年知识分子，以文会友，诗酒唱和，相互切磋学习心得。

崇祯三年（公元1634年）南京乡试，杨廷枢、张溥、吴伟业、陈子龙等十二名复社成员一举中榜，使复社名声大振。第二年，张溥、吴伟业又在会试中双双登科，震动东南。大江南北的举子们趋之若鹜，纷纷报名加入复社。

昆山县当时推举了优秀的生员18人加入复社，顾亭林在名单中排在第六个。其中，他和同乡人归庄最要好。

归庄是谁呢？归庄（公元1613—1668年），昆山人。一名祚明，字尔礼，又字玄恭、元恭，号恒轩。他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归有光（号震川）的曾孙。

顾亭林和归庄是同龄人，归庄说他俩“同乡同学又同心，却少前贤唱和吟”；亭林则说：“弱冠始同游，文章相砥厉”。“弱冠”就是他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那么，“同心”表现在哪里呢？亭林这样表白：

自余所及见，里中二三十年来号为文人者，无不以浮名苟得为务。而余与同邑归生独喜为古文辞，砥行立节，落落不苟于世，人以为狂。

可见他俩都喜好古文辞，而且文章相互砥砺，不与世俗浮夸的学风相同，因此被当时人目为“狂人”或者“怪人”。比如归庄在明亡之后，“尝南渡钱塘，北涉江淮，所至遇名山川，凭吊古今，辄大哭，见者惊怪。”他晚年穷得没有土地，甚至“没无半间屋”，他却反而庆幸自己不要向清政府纳粮，流露出强烈的民族意识。所以有人称他俩是“归奇顾怪”。

先谈谈“归奇”。归庄的确可以称得上是旷世奇才，他多才多艺，才华横溢，年轻时，就经常跟父亲游学于常熟钱谦益的门下。他的文章继承了曾祖父震川先生的衣钵，绘画较父亲归昌世更有神韵，诗歌豪放悲怆独树一帜，书法纵横恣肆，说得上样样皆能。

据说归庄纵揽六艺百家，下笔千言，年轻时就极负盛名。他写文章多为事而发，很少有应酬之作。有人想出重金求他作“某某堂记”，都被拒绝。归庄晚年，用心校订出版了曾祖归有光的《归震川先生集》40卷。

归庄的诗歌，是同时代人当中极富才气和灵气的。朱彝尊评论他“诗仿香山（白居易）、剑南（陆游），而豪迈过之。”亭林称之“峻节冠吾侪，危言惊世俗。常为扣角歌，不作穷途哭。”在清初诗坛归庄的地位是相当高的，他

和钱谦益交往甚密，钱谦益在八十一岁的时候，作了一篇很长的五古，共八十二韵，赠给他，并说是“戏效玄恭体”。其中有：“子有诗百篇，稿本度吾匱，元气含从衡，冥涨失津涘。”又说“摇笔断修蛇，垂芒射青兕”，对归庄诗歌成就十分推许。

归庄最为著名的一首诗歌，当数《万古愁曲》。此曲自盘古开天辟地叙起，一直叙述到清兵南下，金陵陷落，评论者都把这首曲比作为当世的《离骚》与《天问》。相传清世祖顺治帝对此曲颇为欣赏，还命乐工在席间歌以佐食。该曲也有题王思任等其他人所作，后来魏禧、全祖望都认定是归庄手笔。魏禧评价归庄说：读了这个曲子，我担心这个人不容易接近。

归庄诗风还不乏诙谐和自嘲。在《呆》诗中说自己：“看来耳目尽聪明，不道痴呆自性生”。晚年穷困潦倒，只好在昆山金潼里归震川墓旁边结一草庐，屋里家具破碎不全，多用草绳扎牢，归庄并不以为然，还在门堂之上大书一匾“结绳而治”，并且自题堂联曰：

两口寄安乐之窝，妻太聪明夫太怪！

四邻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

因此，昆山人都叫这位玩世不恭的归庄为“归痴”。过年的时候，他在门口贴上自撰的春联：“一枪戳出穷鬼去，双钩搭进富神来”，其幽默如此。

归庄的绘画以墨竹著称。上规夏昶，下启郑燮（板桥），

书卷气极浓，不落俗套。其绘画作品流传不多，只有《墨竹图》、《竹石图》等几种。归庄书法功底极深厚。年轻时应试，他竟然用篆隶真草四体写五经文字，让主考官大为吃惊。前人说他“善擘窠大字及狂草、墨竹，醉后挥洒，旁若无人。”他也每每自称狂草近代无敌，只要有人送酒来，长笺短幅杂然并进，日夜挥洒没有倦意。走脚的贩夫、相帮的佣人都是可以求得他的墨宝，就是不喜欢应酬有钱人家或是政界要人。现在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和太仓博物馆都收藏他的书法作品。

再说说“顾怪”。顾亭林怪在那里？有人讲是因为长相怪。亭林三岁得过天花，全祖望在《亭林先生神道表》中说：“其双瞳子，中白而边黑，见者异之。”看来主要问题出在眼睛上，一般人看见自然不会习惯。从现代医学角度看，他的眼睛很可能是因为生过天花造成斜视，《亭林年谱》上说“左目为眇”，也有人说他的左眼可能失明。不过据他的朋友王山史说，亭林“手所抄录，皆作蝇头行楷，万字如一”，似乎看不出有严重的眼疾障碍。

亭林的“怪”可能不只是相貌上，根本的“怪”是在于他的性格，与当时一般生员落落寡合。他读书，不为功名利禄，而注重博古通今，专攻“实学”。这对于那些追名逐利的人来说，简直无异于“大傻瓜”。当时有人说他“孤僻负气，讥诃古今”，“独兀傲倜傥，以节行自厉”，“以是吴人訾之”。归庄对亭林无疑是了解最深的，曾在给他

的信中说道：

友人颇传兄论音韵，必宗上古，谓孔子未免有误。此语大骇人听，因此度兄学益博，而僻益甚。将不独音韵为然，其它议论，倘或类此，不亦迂怪之甚者乎！却子语迂，单子知其不免，况又加之怪乎？此平生故人所以切切忧之。愿兄抑贤知之过，以就中庸也。

想劝他能够折中一点，但是亭林的性格是方正不变的。他在济南因“文字狱”吃了七个月官司，出狱后作的《赴东诗》中云：“禀性特刚方，临难讵可改。”“所秉独周礼，颠沛犹在斯。”“永言矢一心，不变同山河。”实在“怪”得可以，表现他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气概和知识分子的良知。

第七节 屡试科举

明末江南的社会经济已经跃居全国首位。这里农田阡陌，水网纵横，经过近千年的精耕细作，当时水稻亩产可以达到出米二百至四百斤，所谓“苏松熟，天下足”，经济较全国的总体水平高出许多。当时的苏州城商业发达，集市繁荣，呈现出一派繁华的景象。

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留给人们“学而优则仕”一条出路。在江南，中等以上家庭，都要延师教子。加上

江南地理情况特殊，土地相对比较分散，中小地主遍及城乡，从而产生了一大批书香门第，影响所及，使整个社会读书蔚然成风。即使家里仅有十亩瘠田，日子过得十分拮据，也要让小孩子读书，家长日日夜夜盼其能鲤鱼跳龙门。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天下的举子进京赶考，各地的举子都夸自己家乡的特产，山东人说山东的红枣最好吃，山西人说山西的陈醋最香，江西人夸江西的瓷器最美……在座的江南人一直没有说话，大家都想知道江南人有什么特产，那位苏州人，想了一想，说：“我们苏州的特产是状元。”在座的举子听了此话无不惊讶万分，从此再也无人敢自吹自擂了。

等到顾亭林十三四岁的时候，就有家族里的长辈建议，让他进县学学习科举文字。蠡源公本来不是很赞成，但是考虑到亭林天资聪颖，一点也不比其他小孩子差，早一点取得功名也未尝不可，就答应了。于是，从亭林十四岁以后，一直到二十七岁的十四年中，几乎年年都参加科举考试。他前前后后参加了十多趟“年试”或“乡试”，可是都没有考得功名。

是不是顾亭林读书不认真或不专心呢？显然不是。据他自己讲，年轻的时候和归庄，还有嘉定的吴其沆等同学经常一起读书。每年春夏是温习经书的好时间，亭林年稍长，坐在中间，其他人坐在左右，每人桌前各放十三经注疏一本，让其中的一个人朗诵，其他人静心听，遇到字句

不同或偶然忘记的，大家一起讨论。每次读二十页换一个人读，四个人周而复始，一天可以温书二百页左右。温习完十三经以后，就接着温习《史记》、《前汉书》、《后汉书》或者《南北史》。这种读书方法比较古老，但是从现在来看，仍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那末他为什么考不中呢？原因大概有两个。第一，整个社会只有科举这么窄的“华山一条路”，全国有数万名生员都来争夺有限的功名，凭本事原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二，科举考试“僧多粥少”必然造成强烈反差，一些所谓的读书人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去跑路子、通关节，官场的腐败导致了科场的黑暗，想要凭一手好文章就可以考中功名实在过于天真。虽然对于科场的激烈竞争，大家心里明白，但是还得走这条路。正如归庄无可奈何地说过：“时势处此穷极，功名终未肯灰心，尚有一路可走，岂肯安坐？”所以只好不得已而为之。

青少年时代的亭林游学于党社之间，也同样好为词章之学。当时他和同学们大多“为诗多怨声，近《西州》、《子夜》诸歌曲”，无非是一些莺莺燕燕的颓靡之作，或者是无病呻吟。他在晚年对自己的外甥说：“追忆曩游，未登弱冠之年，即与斯文之会，随厨后之后尘，步扬班之遗躅，人推月旦，家擅雕龙……”在与朋友的书札中也谈及：“弟年少时，不过从诸文士之后，为雕虫篆刻之技。”加上当时的社会到处是宋明理学家的“性理之书”，多为亭林以

前没有接触过的，看了十分好奇。蠡源公得知这些以后，非常严肃地教训他：“作为一个读书人应当追求实学。实学应当从史入手，凡是涉及天文、地理、兵法、农业、水利等知识，以及一代代人传下来的经典文章，都不能不熟究。”这样他才逐渐抛弃了词章之好。后来他读《宋史》，其中讲道刘忠肃每每告戒子弟说：“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亭林自从读了这一段话之后，从此就不再作应酬文字了。

自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秋闱不中之后，二十七岁的亭林“感四海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他清醒地认识到：“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其进于此，而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他决心和当时空泛的学风划清界线，决定不再把宝贵的精力放在科举考试和八股文章上，他要从此告别科举的“名利场”，静下心来做学问。于是，他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文、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所心得，就摘录下来。《天下郡国利病书》这部巨著，就是从那一年开始着手编纂的。

第二章 国破家亡

现代文学大师孙犁在《曲终集》中写道：“明末清初，的确是一个大动乱的时代，知识分子很难应付得当，非死即降。像钱谦益、吴伟业这些人，是很狼狈的，而顾炎武和归庄却能活下来，是各有各的特殊能力和办法，实在不容易想象了。”

第一节 明朝覆灭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的歪脖树上吊自杀，明朝灭亡。然而，大明王朝的覆亡，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当时整个统治阶级腐化贪污已经成为

风气，人们这样形容：“文官爱钱不怕死，武官怕死又要钱。”老百姓的民谣中唱道：“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十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真实地反映了晚明朝政混乱与腐败状况。顾亭林从科举失利的体验中已经看出来，他讽刺说：“公卿不难致，所患无金宝。”在《大行哀诗》中他写道：

世值颓风运，人多比德朋。

求官逢硕鼠，馭将失饥鹰。

深刻地剖析了这个腐朽政权必然覆亡的原因。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当时明朝镇守山海关的宁远总兵吴三桂，本来抵挡着满清的进犯，得知明朝政权覆灭了，一时不知所措。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归顺闯王率领的大顺军，继续把守边关；另一条路投降满清，充当汉奸。就在他犹豫不决的关键时刻，突然消息传来，自己在京城的宠妾“秦淮八妓”之一的陈圆圆被大顺军将领刘宗敏掳去，吴三桂闻讯后怒不可遏，“冲冠一怒为红颜”，无耻地投降了清朝，打着为大明雪耻为崇祯皇帝报仇的旗号，引清兵进入山海关。最后，立足未稳的大顺军被迫撤出京城，清兵占领了北京。十月，清朝成立，建号“顺治”。

北京失守之后，北方的大好山河很快落入满清统治者手中。差不多同时，凤阳总督马士英和阉党阮大铖等在南

京拥立福王朱由崧，成立弘光小朝廷。马阮互相勾结，一面借口筹措军饷，蒙蔽百姓，大肆搜括；卖官鬻爵，荒淫无道。一面排斥正直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堵塞言路，把持朝政。

当时，南明政权只有兵部尚书史可法带兵在江淮一带组织过有力的抵抗。史可法一心想报国雪耻，史书上说他“为督师，行不张盖，食不兼味，夏不幕，冬不裘，寝不解衣”。顾亭林听说史可法督师扬州，对这位民族英雄寄予了极大的敬重，把史可法比作“祖生多意气，击楫正中流”，盼望能够“河上三军合，神京一战收”。

可是马士英、阮大铖等在南京擅权内讧，忙着给新主子“选淑女”；而江北四镇的悍将有的骄横跋扈，互相争斗，有的望风而逃，自保一隅。史可法空有坚持抗战的计划与决心，而得不到任何支援，最后被拖得“兵顿饷竭”。扬州失守后，清兵在城中进行了长达十日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就是历史上最令人惨痛的“扬州十日”。与顾亭林一同被誉为清初诗坛双子星的吴嘉纪，用诗歌揭露当时清兵令人发指的残暴罪行：

忆昔芜城破，白刃散如雨。

杀人十昼夜，尸积不可数。

伊谁蒙不戮？鬼妻与鬼女。

他更用鲜血淋漓的笔触、骇人听闻的数字，勾画了扬州的悲惨景象：

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

杀人一百四十万，新城旧城内有几人活？

公元1645年春，在昆山县令杨永言的极力推荐下，弘光朝廷任命顾亭林为“兵部司务”的小官职。兴奋之余，亭林精心撰写了《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四篇文章，围绕南京政权的生死存亡问题，针对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建议和切实可行的措施，史称“乙酉四论”。《军制论》主要是提出关于整顿军事政策的方案，《形势论》着重就地理角度讨论恢复和自保江山的策略，《田功论》提出的是富国强兵的兵农制度，《钱法论》探讨在战时如何实行特殊货币政策的建议。亭林满心希望朝廷能够予以采纳。

五月初，亭林和比他小二两岁的叔父顾兰服一起，怀揣着四篇文章匆匆地赶到南京去就职。他们住在南京朝天宫内，也就是他的曾祖父兵部右侍郎顾章志在南京的祠堂。两人一起拜谒了先祖，然后到兵部报到。谁料当时阉党掌权，朝政腐败，根本无法就职。吃了闭门羹的亭林，心里凉了一大截，一丈水顿时退了八尺。又听说清兵就要渡过长江，南京城里一片混乱。无可奈何之下，两人只得离开南京，返回苏州。没过几天，南明小朝廷就完蛋了。

第二节 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

公元1645年农历5月15日，清兵攻陷了南京城，之后不到一个月的工夫，江浙两省差不多全落到了满清的掌握之中。清廷向江南民众发布了“剃发令”，要求民众剃头发并改穿服装，以示效忠满清。在剃发令中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话。当“剃发令”下达之后，江南的有识之士们和沦陷区广大民众立刻作出了强烈的反应，纷纷树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前赴后继，英勇奋战，遭到了满清统治者及其投降派的残酷血腥镇压。其中江阴、嘉定、昆山人民的反抗尤为壮烈，遭到的镇压和屠杀尤其惨烈。这场轰轰烈烈的江南抗清斗争持续了近一年，才被满清统治者残酷地镇压下去。顾亭林是积极投身抗清斗争的一分子。

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清豫亲王多铎率大军驻扎在南京，并且在苏州、杭州和吴淞沿海各派驻一军。起义部队一方有原江南总兵吴志葵屯兵海上；另有十余名将官屯兵陈湖（即今澄湖），他们与陈墓乡绅陆世钥等在湖旁组织了千余名乡兵。原兵科给事中陈子龙与举人徐孚远、章简等在松江起义，很快赶到陈湖会合。原吏部主事夏允彝到达海上加入了吴志葵的部队，向各地发出檄文，联络各地士大夫。于是华亭沈犹龙、嘉定黄淳耀、太仓张士仪、宜

兴卢象观、昆山王永祚等纷纷起事，互为声援。昆山县令杨永言带着顾亭林、归庄、吴其沆等人来到王永祚的部队中，听从吴志葵调遣。亭林《千里》诗中记录了这次起义的情形：

千里吴封大，三州震泽通。
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
王子新开邸，将军旧总戎。
登坛多慷慨，谁复似臧洪。

于是，波澜壮阔的江南人民抗清斗争拉开了序幕。不久各路义军相约，由松江兵去攻杭州，太仓兵去肃清沿海，宜兴兵赴南京，吴志葵兵围苏州，等到苏州攻下，诸军协同进攻各自目标。从表面上看，这种一致抗击清兵的形势是一片大好，但是仔细分析，存在不少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些义军各成一支，既互不统辖，又没有经过正规训练。诚如亭林所形容的：“鱼丽笠泽兵，乌合松陵将。”注定这种自发的抗清斗争是最终形不成大气候的。

事实也是如此，吴志葵进攻苏州，参将鲁之奇率一彪人马率先冲进城里，不料中了敌军的埋伏。义军哪里经过这种战争场面，阵脚一乱，就相互践踏，一下子被清兵全数歼灭。苏州兵败之后，一起参加起义的杨永言、归庄与亭林等人只得退守昆山。

与此同时，江阴民众打出了“大明中兴”的旗号，推荐陈明遇、阎应元担任起义首领。清兵数万人马把江阴县

城团团包围，城内义军奋勇抗敌，坚持了两个多月，顶住了清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城破之后，义军仍然拼死巷战，“竟无一人降者”，陈明遇在巷战中牺牲，阎应元负伤后投湖，被清兵拖上岸，不屈遇难。清兵把整个江阴县城屠杀了一遍，到出榜安民的时候，城中百姓仅存“大小五十三人”。有人写了一副对联纪念江阴人民的抗清事迹：

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同样，在嘉定县，人民也举起义旗，侯峒曾、黄淳耀率民兵，与清兵死战半个多月。城破之后，清兵大肆屠杀，抗清志士全部遇难，被屠杀者数万，即史书上令人发指的“嘉定三屠”。

第三节 昆山保卫战

清兵攻陷南京的消息传来，昆山城中的老百姓非常惊慌，大户人家纷纷抛弃家园，携家带口到张浦、陆家、安亭等周边乡镇避难。城里有一些奸民一看机会来了，就勾结街面上的小混混，乘机四处打劫哄抢财物，一时间城中十分混乱。

昆山县令杨永言知道形势难以控制，就在五月二十二日，把关在牢中的所有囚犯全部释放了出去。而这时候县

衙中大大小小属官衙役纷纷逃匿。县令杨永言见形势不妙，连忙弃印挂官而去，潜伏到泗桥陈宏勋家里。六月初七，清廷派人到昆山发布安民告事，并向地方上索取昆山城的地图。第二天，主管水利的县丞阎茂才打了白旗，带了几个乡绅，赶到苏州胥门外乞降。清军就任命阎茂才为昆山县的新任县令。

闰六月十一日这一天，清廷又一次下达了“剃发令”，规定十天之内男子一律剃发易服，声明凡“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这样一来，激起了昆山百姓的强烈愤慨，纷纷表示誓不从命。十三日，刚刚按照满清人的样子剃好头、穿好官服的阎茂才出来了。见他四周的头发都剃掉了，中间留了铜钱般一大块，编成长辫子拖在脑后，活脱脱一个“金钱鼠尾”。他神气活现地叫兵丁巡街出示告事，一再责令百姓一律剃发，还亲自登门拜会乡绅和遗老，要求他们带头剃发。可是，遗老们都不肯答应，为什么？因为汉族人从小受教育，肤发是受之父母，随便剃发就是不孝，而且要剃成满族的样子，更是不忠，岂能轻易从命？阎茂才一看软的不行，就用硬的，下令凡是不从的，按令斩首示众。

这一来可不要紧，昆山城内一片骚动，群情激愤，大伙儿不约而同地蜂拥到教场上，共有二三千人，人们高呼“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发人”等口号，决心要与清兵血战到底。在这关键时刻，归庄大踏步跳到台上，振臂一呼：

“众乡亲！今日之事，必须先斩了那个投降派狗官阎茂才。”率了众人就向县衙冲去。正在此时，有人来报，从陈墓起兵的太学生陆世钥，已经抓到了正要逃跑的阎茂才，并把他绑在船上。众人放火烧了县衙后，就赶到小西门驷马关桥，归庄大声说：“不杀了这个投降派，不足以坚定军心！”又对陈墓义兵说：“我们应该先把这条满清走狗斩首示众，再兴义师抗清。”此时，早有人把那个狗官牵上岸来，当时乡兵们大多只拿了枪棍，只有归庄带了一把刀，归庄怒目圆睁，正要拔刀亲自结果狗官性命。正在这当口，有人大喝一声：“且慢！”归庄定睛一瞧，原来是街上有名的屠夫张寿，张寿对归庄说：“归先生，你是读书人，动刀动枪的活你不惯常，来！把宝刀给我，我来斩了那鸟官！”于是接过刀向狗官砍去，阎茂才一见心说不好，转头拼命往河里跳去，张寿那里肯放，一跃而上跳进河内，在水中一刀把贼官的脑袋砍了下来。张寿上岸提着刀回来复命，归庄拱手说：“多谢壮士相助，此刀赠予壮士作个纪念吧！”

杀了阎茂才之后，由贡生朱集璜与周室瑜、陶琰、陈大任等乡绅，共同商议推举原狼山总兵王佐才，担任起义军的主帅。此时，参将陈宏勋、前知县杨永言等人也招募了数百兵丁进城助阵。杨永言担任军中监纪，仍然知理县里的日常事务。听说昆山起义，顾亭林告别了嗣母和朋友陈鼎和，从乡下赶到昆山，与同学归庄、吴其沆等一些青

年士子，在军中协助管理粮草器械和起草公文传递军令等事务，准备跟清兵大干一场。

七月初二，清兵大军压境。起义军磨拳擦掌准备迎战清兵。可是这些乌合之众哪里是正规部队的对手？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对比下，昆山军民仍然与清兵激战了几天几夜，最终城池被清军攻破，起义失败了。

顾亭林亲身经历了这场战斗，战斗是非常艰苦的，军民们同仇敌忾英勇献身，场面十分壮烈！他在《秋山》诗中描写道：

昨日战江口，今日战山边。
已闻右甄溃，复见左拒残。
旌旗埋地中，梯冲舞城端。
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冈峦。

七月初六，清兵攻陷昆山城。他们首先大肆搜捕抗清志士，点名要抓杀阎茂才的人，归庄知道形势危急，急忙化装逃出城去。亭林也因为掩护得好，逃脱了。不久，清兵抓住了屠夫张寿，清兵首领反复盘问是谁倡导起义，起义军的主帅又是谁，张寿怒斥道：“那鸟官是我杀的，如今要杀就杀，要刚便刚，何必多问！”壮烈牺牲。昆山起义主帅王佐才，此时也被清兵捕获，王帅怒目圆睁，大呼：“起兵主帅是我，无关老百姓的事，速杀我而散百姓！”死时颜色不变如平常，从容就义。

第四节 国难与家仇

昆山城破之后，清兵烧杀抢掠，城中四万人民惨遭屠杀。

当时，顾亭林的生母何氏夫人和顾缵、顾绳两个弟弟及弟媳在城中，大家都劝何氏夫人出城避难，老夫人说：“老妇死也一定要死在这里！”顾氏兄弟俩都不敢离开母亲一步。没过多久，清兵杀进城来，两兄弟出门抵抗，双双遇难。媳妇朱氏知道大事不好，拿刀刺喉咙自尽，没刺到要害，就昏死在瓦砾之中。这时候街道上到处是遇害乡亲的尸首，老夫人见媳妇还剩下一丝气息，就一个人守着不肯离去。突然一群游骑兵飞驰而过，一刀砍来，老夫人躲闪不及，右臂便被砍断了，顿时倒在了血泊之中，不醒人事。过了很长时间，媳妇朱氏苏醒了过来，看到老夫人倒在血泊中的样子，她悲痛欲绝。当发现婆婆尚存呼吸，她顽强地从裙上撕下了一块布，为何氏老夫人包扎好伤口，自己也用布头塞住颈部，抱着婆婆躲到一间破屋子里。第二天，朱氏找到一条船，护着何氏老夫人登船离开昆山城，真可谓是劫后余生。

在此之前，顾亭林已经把家人和嗣母王氏安顿到了相对比较安全的昆山常熟两县交界处一个叫“语濂泾”的小村落（今常熟市唐市镇）。昆山城破之际，顾亭林潜回语

濂泾，才算幸免于难。后来他在《寄弟纾及友人江南》一诗里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自昔构难初，城邑遭屠割。

几同赵卒坑，独此一人活。

看到昆山人民惨遭屠戮，悲愤中归庄写下了著名的《悲昆山》诗，揭露敌人的残暴，诗中写道：

悲昆山，昆山城中五万户，丁壮不□□□□，顾同老弱妇女之骸骨，飞作灰尘化为土。

悲昆山，昆山有米百万斛，战士不得饱其腹，反资贼虏三日谷。

悲昆山，昆山有帛数万匹银十余万斤，百姓手无精器械，身无完衣裙，乃至倾筐篋，发窠窖，叫头乞命献与犬羊群。

呜呼！

昆山之祸何其烈，良繇气懦而计拙。

身居危城爱财力，兵锋未交命已绝。

城陴一旦驰铁骑，街衢十日流膏血。

白昼啾啾闻鬼哭，乌鸢蝇蚋食人肉。

一二遗黎命如丝，又为伪官迫畏头半秃。

悲昆山，昆山诚可悲！

死为枯骨亦已矣，那堪生而俯首事逆夷？

顾亭林在《秋山》诗中也写道：“可怜壮哉县，一旦生荆杞。”他还控诉那些惨无人道的清兵对当地人民进行

的野蛮掠夺：“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红颜。吴口拥棹驰，鸣笳入燕关。”

尽管昆山沦陷了，但是仁人志士们决不甘心向敌人妥协投降，他们宁可被杀头，也决不肯向敌人低头。《秋山》诗讲到：“归元贤大夫，断脰良家子”。

那些壮烈殉国的“归元贤大夫”，他们是那些人呢？这里以朱集璜和陶琰两位为例。朱集璜就是“昆山三贤”之一朱柏庐的父亲，朱集璜和陶琰是郎舅关系，陶琰还是朱柏庐的丈人。众人杀了投降派阎茂才之后，就商议如何起兵、如何拒敌，朱集璜、陶琰从花桥带乡兵进城，推举原狼山总兵王佐才为主帅，他们两人便在帐前出谋划策扶佐主帅。昆山城破，两人明白自己决不能落到清兵手中，所以投河的投河，上吊的上吊。朱集璜投河前在自己的衣带间写下了《绝命词》称：“可质祖宗，可对天地，生无自欺，死复何愧！”投东禅寺（今集街）后河而死。当天晚上，陶琰也在腰带上写下“生为明人，死为明鬼。”自缢而亡。后人把他二人的棺木停在一起，当时人这样唱：

朱断断，陶植植；

生同年，死同日；

生同学，死同域。

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朱柏庐为了不忘家父壮烈殉国，自比晋人王裒，取庐墓攀柏之义，自号“柏庐”。清廷开博学鸿词科，他以死相拒，发誓不仕清廷。他的著作《无

欺录》和《愧讷集》，都是用父亲《绝命词》来命名的。

亭林的朋友吴其沆和两个亲弟弟就是所说的“断脰良家子”了。前文中提到过，亭林的两个同胞弟弟顾缵、顾绳本来也可以逃过这一劫，但他俩为了保护家母，抵抗入城的清兵，双双遇难。而比亭林、归庄年少七岁的好友吴其沆，也在这场战斗中不幸牺牲了。吴其沆，字同初，嘉定（今属上海）人。据亭林《吴同初行状》中回忆：吴其沆出身书香门第，他天生早慧，不管是《左传》还是《南北史》，读过后都牢记不忘，文章下笔数千言，考秀才时得了第一名。此人极讲信誉，忠诚不二。他平生与顾亭林、归庄、顾兰服、徐履忱等最合得来，经常一起交游。满清入京以后，他非常悲愤，一变其原来缠绵的诗风，所作的《大行皇帝》、《大行皇后》哀悼诗，大有古人遗风，当时受到大家一致赞扬。那年五月初一，其沆和几个好朋友一起到亭林家里为嗣母王氏做六十大寿，饮至半夜，抵掌而谈，十分兴奋，一直到第二天天亮才离去。后来，清兵攻打昆山城，其沆积极参加抗敌战斗，坚持守城，有人劝他快点撤离，他却不肯后退，英勇阵亡。当时昆山城中被害军民达四万余人，没有人知道他的尸首在何处。三个月之后，亭林路过吴家，专程探望他的母亲，老人家老泪纵横地对亭林说：“吴家五代单传，我老太婆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女儿被鞑子抓去了，儿子死在他们手里！可怜我的小孙子，只有二岁，也死了，……”听了老人一番

哭述，亭林禁不住泪流满面。

可是亭林并没有因为抗清斗争的失败而消沉，他在诗中说：“勾践栖山中，国人能致死”，用越王勾践生聚复国的历史故事来激励自己，也以此表达当时抗清志士和江南人民救亡的决心。

第五节 嗣母遗训

七月上旬，昆山、嘉定相继沦陷；到七月十四日，常熟也陷落了。第二天，侨居在常熟语濂泾的王氏感觉到周边气氛不同寻常，在她的一再追问下，亭林才把两京沦陷、苏州失败、昆山城破、常熟失守等事情告诉了母亲。王氏听了，轻轻叹了一口气，就回房去了。从当天起，王氏就再也没有进过一粒米，这样整整熬了十五天，在临终前，王氏把亭林叫到床边，留下遗言：“尽管我是个妇道人家，然而身受国恩，如今国亡，则身与俱亡，是义所应当的。你切记不要做异国的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那么我死之后就可以瞑目于地下了！”说完合上眼睛了，那天是七月三十日。

王氏绝食殉国，不仅仅保存了她一生的名节，更重要的是她以自己的死来谏劝了亭林“无为异国臣子”，这一行动对亭林的触动太大了，一直影响了亭林一生的节行。

在嗣母爱国精神的感召之下，亭林终身不仕清廷。尽管清廷多次征召，他都以死相拒，他曾说：“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甚至说“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一死而先妣之大节愈彰于天下，使不类之子得附以成名，此亦人生难得之遭逢也。”亭林六十八岁那年，在山西汾州得到自己原配夫人太仓王氏过世的消息后，作《悼亡诗》，其中一首说：

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

地下相烦告公姥，遗民犹有一人存。

诗中希望他的夫人王氏转告九泉之下的公公婆婆（即王氏），自己作为明朝的遗民始终不曾改变。

嗣母殉国刚过两天，清兵就到了语濂泾。亭林只得将嗣母遗体草草入殓，就离开了。他自己曾经痛心的说起这件事：“……若不孝者，何以安吾母？而犹然有恬于斯人之中，将于天崩地坼之日，而卜葬桥山之未成，而马鬣之先封也。此不孝所以痛心擗踊，而号诸当世之仁人义士者也！”到十二月，亭林才回到语濂泾，暂时将嗣母的灵柩蒿葬于嗣祖的墓旁，准备在适当时候再行厚葬。

明朝覆灭了，家乡被占领了，嗣母也去世了，为了保存自己，三十三岁的亭林只得隐姓埋名。于是，他改名炎武，亦作炎午。

为什么要这么改？“炎武”两字取自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学生、南宋遗民王炎午的名字。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王炎午，原名应梅，字鼎翁，号梅边，宋亡后更名炎午，江西吉州人。早在青少年时期，王炎午就很崇拜文天祥的品格和才学，常从之游学。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文天祥在赣州起兵，年仅24岁的王炎午，怀着满腔爱国热情，持牍谒军门，向文天祥建议：“愿明公复毁家产，供给军饷，以昌士民助义之心；请购淮卒，参错戎行，以驯江、广乌合之众。”文天祥听后高兴地说：“军中得一小范矣。”把王炎午比做项羽军师范增，希望他留在幕中。王炎午考虑到父亲去世还没有落葬，母亲又生病危在旦夕，只好请求归养。文天祥理解他的一片孝心，没有勉强挽留。后来文天祥被叛徒出卖被囚，王炎午为了保护文天祥的名节，写了一篇著名的《生祭文丞相文》，文中历陈文天祥“可死”之义，又反复说明古今忠臣死节的道理，希望文天祥以死国表其忠心。可谓激昂文字，感人肺腑。对于王炎午的这番良苦用心，后人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明代散文家钟惺认为：“以文丞相忠义，死固其寻常事，不应以此薄待之；然事关生死，惟恐其一念之差，故不惜苦心苦口而为，此真义士、真门生！使居文丞相之位，是又一文丞相也。”明代大文章家茅坤极力称赞此文：“一段激劝至情，千古可掬。”元人欧阳玄更赞叹其文悲壮雄浑，赞曰：“王鼎翁，宇宙奇士也！”

与此同时，亭林还改了表字，把原来的“忠清”改为“宁人”。“宁”就是南京，“宁人”表明自己仍是明朝的臣

子，决不投降清朝。学者认为亭林改名“炎武”是因人而名，改字“宁人”则是因地而名，充分反映出他热爱故国的情怀和壮志未酬的心情。

第六节 流转吴会间

南京小朝廷覆灭之后，明朝的残余势力继续南逃。王室内部明争暗斗，不可能联合起来，于是几个王室成员分别建立了各自为政的小朝廷。

公元1645年六月，鲁王朱以海“监国”于浙江绍兴。

公元1645年六月，唐王朱聿键“监国”于福建福州，很快又称帝，建号隆武。

公元1646年十一月，桂王朱由榔即位于广东肇庆，建号永历。

他们的立国举动，对江南一带的反清活动，仍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亭林听说唐王在福州称帝，向全国臣民发出收复故国的诏书，他激动万分。后来唐王派了密使，秘密到江南一带，联络抗清志士，并遥授亭林以兵部职方司主事之职。他非常感激王室对他的器重，在《闻诏》诗中表达了他对隆武王朝的忠心。但是，因母棺还未妥葬，最终无法成行。没过多久，唐王的短命政权也失败了。

从公元1646年到1656年的十来年中，是顾亭林一生

中彷徨不定的时期。他在诗中反复自问：

流转吴会间，何地为吾土？

登高望九州，凭陵尽戎虏。

的确，当时的局势非常复杂，一边清政权在江南还没有完全巩固下来，一边明朝的残余势力又不断的反扑，形成了相当长时间的拉锯战局面。这时的亭林，一面积极地联络同志，一面静观形势的变化。每当亭林听到鼓舞人心的新消息，都会激动一番。他听说郑成功等在舟山兴师，打到镇江，便有“长看白日下芜城，又见孤云海上生”的诗句；当闻得山东起义军攻克淄川，执杀降官孙之懈，写下了有名的《淄川行》：

张伯松，巧为奏，大纛高牙拥前后。

罢将印，归里中，东国有兵鼓逢逢。

鼓逢逢，旗猎猎，淄川城下围三匝。

围三匝，开城门，取汝一头谢元元！

何等慷慨激昂；后来，李定国从云南出发东征湘赣，他写道：“传闻西极马，新已下湘东”；鲁王的部将张名振在崇明全歼清军，前锋抵金山时，他又歌颂道：“海师一十万，虎啸临皇州。……沈吟十年余，不见旌旆浮。忽闻王旅来，先声动燕幽。”

可是一次次的希望却又变成一次次的失望，亭林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战友、兄长在历次战斗中阵亡、牺牲，特别是陈子龙、顾咸正等的遇难，使他心如刀绞、痛惜万分。

亭林的好友陈子龙，原名介，字人中，更字卧子，松江华亭人。明崇祯年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清兵入关后，陈子龙率自练水师数千人起义，失败后，遁而为僧。后鲁王密受部院职衔，负责与投降清朝的苏松提督吴胜兆通谋反清。1647年夏，不幸事泄被捕，在押解途中投水自尽，以身殉节。陈子龙是复社的主将，也是几社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诗歌造诣极高，代表作《秋日杂感（客吴中作十首）》，有“满目山川极望哀，周原禾黍重徘徊”之句，十分苍凉，抒发了他强烈的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而“岂惜余生终蹈海，独怜无力可移山。八厨旧侣谁奔起？三户遗民自往还”等诗句，虽然慨叹自己回天乏力，但仍然坚信故国的恢复。他的牺牲，让亭林痛心不已。当时因战事复杂，他俩各自隐蔽潜伏，所以一南一北，陈子龙投宿千灯亭林家，没能和他见上最后一面；夫人王氏仓促准备了一些粗茶淡饭，而陈子龙也没久留，第二天便登舟去了昆山，不久被捕牺牲。

当时，亭林的同乡顾咸正，也刚刚南归。他是明朝大臣顾鼎臣的曾孙，虽然他与亭林不属一支，但两人友谊颇深，亭林与之结交，按行辈称之为族父。咸正，字端木，明天启甲子举人，曾任延安府推官，丙戌（公元1646年）四月，从关中归江南，听说唐王在福建即位，就上一件密折，托人转达。顾咸正想要约亭林一同赴福建，亭林因嗣母尚未落葬，就没有成行。亭林为此赠诗鼓励他：“如君

俊拔才，久宜侍金闺。会须洗中原，指顾安黔黎。”不料密折在途中被巡逻兵搜获，报告了提督吴胜兆，幸亏吴胜兆已经决定反清，所以得到这份密件后秘而不发。等到吴胜兆反清失败以后，密折就被查了出来，于是顾咸正和兄弟顾咸建、顾咸受，以及两个儿子顾天逵、顾天遴五人先后被抓到南京，朋友们尽力相救咸正的两个儿子，未能成功。不久，父子兄弟五人纷纷遇害。亭林作诗哀悼：“父子兄弟间，五人死相继。呜呼三吴中，巍然一门第。”

亭林并不因此而沉沦，恢复故国的信念始终没有改变。他说：

仆本吴趋士，雅志凌秋霜。

戮力事神州，斯言固难忘。

我宁为楚囚，流涕空沾裳。

又说：“人寰尚有遗民在，大节难随九鼎沦！”他常常一个人“开篋出兵书，日夜穷揣摩”，坚信“中原有大势，攻战不在多。”并写下了千古名诗《精卫》。

《精卫》是亭林诗歌的代表作。精卫，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鸟。《山海经》上讲：发鸠山上有一只叫精卫的鸟，是炎帝的女儿女娃所变。女娃游东海时被淹死，死后化作一只精卫鸟，为了复仇，它不停地到西山衔木石去填东海。古代许多文人常常以精卫坚强不屈、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来勉励自己。晋代诗人陶渊明就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苍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之句。亭林在诗

中借精卫填海忠贞不渝的精神，寄托自己的志向，表达自己抗清斗争的决心。诗中写道：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沈心不改；
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
鹊来燕去自成窠。

诗中一问一答一叹，问，是亭林扪心自问，答，是亭林借精卫之口说出自己的誓言，叹，是嘲讽那些投降派的卑劣行径，表达了爱国志士精忠报国的高尚情操。

第七节 侨居钟山

在彷徨与苦闷的时候，朋友们终于又相聚在一起了。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苏松一带的复社成员和爱国人士在吴江成立了“惊隐诗社”，入社的成员不下数百人。亭林和归庄又一同加入了这一反清组织。他们“以故国遗民，绝意仕进”相激励，经常“往来于五湖三泖之间”，明里以文会友，诗酒唱和；暗中相互联系，筹谋计划，宣传反清，在江南反清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一直到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明史案”发生后，“株连同社，有罹法者，

社集遂辍”，诗社十多年的活动才告结束。在“惊隐诗社”中，亭林又结交了许多新朋友，其中吴炎、潘怪章、王锡阐、戴笠等人都成为他的知心朋友。

由于亭林多年以来一直坚持不剃发不易服，因而只要一出门，就变得十分惹眼，行动非常不便。加上家族内部发生了一些矛盾，同族中也有人想乘机加害于他，此时已经“故乡不可宿”，亭林无奈之下“飘然去其宇”，只能暂时避走他乡。然而到外乡又必然“往往历关梁，又不避城府”，一副明朝读书人的打扮出门是万万不行的，实在是迫不得已，亭林“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

既然扮做商人，总得要做些买卖生意，亭林选择了做布匹生意。他在苏州、常熟、吴江、嘉兴等地采购了一些布匹，然后到南京、淮北一带销售。一路上，他到了金坛，游览顾龙山。想当初，明太祖朱元璋东征时，曾驻扎此山，并有御制词一阙，亭林看到碑石仍在，而江山已改，不禁感慨万分。不久又到了镇江，登北固楼，举目远眺，西望帝京，黯然泪下。

第二年春天，亭林抵达南京。他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明孝陵，此时的明孝陵已经不再是皇家的禁地，保卫陵墓的守军都已散去，而普通的老百姓害怕官府又不敢轻易接近，整个陵墓空荡荡的。亭林恭恭敬敬地来到明孝陵，这是他第一次正式拜谒，他从陵外的下马坊开始步行，走在长长的神道上，高大的石雕神象、神驼和威武的文官、武

中借精卫填海忠贞不渝的精神，寄托自己的志向，表达自己抗清斗争的决心。诗中写道：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沈心不改；
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
鹊来燕去自成窠。

诗中一问一答一叹，问，是亭林扪心自问，答，是亭林借精卫之口说出自己的誓言，叹，是嘲讽那些投降派的卑劣行径，表达了爱国志士精忠报国的高尚情操。

第七节 侨居钟山

在彷徨与苦闷的时候，朋友们终于又相聚在一起了。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苏松一带的复社成员和爱国人士在吴江成立了“惊隐诗社”，入社的成员不下数百人。亭林和归庄又一同加入了这一反清组织。他们“以故国遗民，绝意仕进”相激励，经常“往来于五湖三泖之间”，明里以文会友，诗酒唱和；暗中相互联系，筹谋计划，宣传反清，在江南反清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一直到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明史案”发生后，“株连同社，有罹法者，

社集遂辍”，诗社十多年的活动才告结束。在“惊隐诗社”中，亭林又结交了许多新朋友，其中吴炎、潘柽章、王锡阐、戴笠等人都成为他的知心朋友。

由于亭林多年以来一直坚持不剃发不易服，因而只要一出门，就变得十分惹眼，行动非常不便。加上家族内部发生了一些矛盾，同族中也有人想乘机加害于他，此时已经“故乡不可宿”，亭林无奈之下“飘然去其宇”，只能暂时避走他乡。然而到外乡又必然“往往历关梁，又不避城府”，一副明朝读书人的打扮出门是万万不行的，实在是迫不得已，亭林“稍稍去鬢毛，改容作商贾”。

既然扮做商人，总得要做些买卖生意，亭林选择了做布匹生意。他在苏州、常熟、吴江、嘉兴等地采购了一些布匹，然后到南京、淮北一带销售。一路上，他到了金坛，游览顾龙山。想当初，明太祖朱元璋东征时，曾驻扎此山，并有御制词一阙，亭林看到碑石仍在，而江山已改，不禁感慨万分。不久又到了镇江，登北固楼，举目远眺，西望帝京，黯然泪下。

第二年春天，亭林抵达南京。他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明孝陵，此时的明孝陵已经不再是皇家的禁地，保卫陵墓的守军都已散去，而普通的老百姓害怕官府又不敢轻易接近，整个陵墓空荡荡的。亭林恭恭敬敬地来到明孝陵，这是他第一次正式拜谒，他从陵外的下马坊开始步行，走在长长的神道上，高大的石雕神象、神驼和威武的文官、武

将，令人肃然起敬；进入四方城内，殿宇巍峨。在大殿前，亭林深深行了大礼，感慨万千，当下作了《恭谒孝陵》诗一首。随后，他又赶到朝天宫，再次凭吊其先祖南京兵部右侍郎顾章志的祠堂。

此后数年中，亭林常侨居南京神烈山（今钟山）南山脚下，隐姓埋名，自署“蒋山佣”，表示自己永远是明朝臣子。亭林的《蒋山佣诗集》、《蒋山佣残稿》等也以此为名。他在《侨居神烈山下》一诗中说：

典得山南半亩居，偶因行药到郊墟。
依稀玉座浮云里，落莫金茎淡日初。
塔葬属支城外土，营屯塞马殿中庐。
犹余伯玉当年事，每过陵宫一下车。

在此期间，亭林以南京为据点，足迹遍及江淮一带，先后到过苏北的清江浦、王家营；游历仪征、太平、芜湖、燕子矶等地。每到一处，都凭吊胜景名迹，抒发自己对故国的怀念之情。同时，亭林也结识了万寿祺、王略、阎尔梅、张弢等遗民。

亭林先在淮安结识了王略。王略，字起田，淮安山阳人。王略虽然是淮上的大户，但他不同于一般的富家子弟，为人正直，讲信用，重友情，在亭林最困难的时候支持过他。亭林在淮安一带，盘桓了很久，有机会结识当地的“贤人长者”，就同他最合得来。后来潘怪章遭遇“明史案”被杀，其弟潘耒改名换姓投奔亭林，因亭林在北京，就让他

暂时避难王家。王略与潘耒素昧平生，但是他说：“顾宁人好朋友的弟弟，不就像我的弟弟一样吗？”冒着极大的危险收留了潘耒，后来，还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当亭林在北方游历二十多年之后，王略就对他讲，“你游历天下二十年，年纪一天天大了，应该休息一下了，希望你能到我家，你衣食住行的一切事情，我都可以帮你操办。”亭林评价他的为人：“少而孝，长而恭。好礼而敦，乐善而从。为义勇而与人忠。”

在南京期间，他结识了著名遗民万寿祺。万寿祺，字年少，又字若，别号内景道人、寿道人，江苏徐州人。原明举人，工诗文，通女红，善书画篆刻。清兵南下，他曾与陈子龙等各举义旗抵抗，失败后出家为僧，法号慧寿，也称明志道人。后移居淮安。他们两人相互仰慕对方的气节，不过以前没有机会相识。那年秋天，亭林从常熟唐市经商到淮安一带，特地访问了万寿祺。实在相见恨晚，亭林当场赋诗一首《赠万举人寿祺》，两人遂定交。临别时，万寿祺画了一幅《秋江别思图》相赠，并在画上写了一个题记，与亭林共勉。

在南京一带亭林还遇见了十多年前的老朋友朱四辅。朱四辅，字监纪，江苏宝应人，明诸生，“少负异才，涉猎群书，谙经济之学，有用世志”。入清之后拒不仕清。亭林这时候遇到朱四辅，两人回忆起十年来走过的艰难岁月，百感交集，只是如今昔日的战友，已经两鬓斑白，他

当下赠朱四辅一首诗以示鼓励：

十载江南事已非，与君辛苦各生归。
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七日围。
碧血未消今战垒，白头想见旧征衣。
东京朱祐年犹少，莫向尊前叹式微！

第八节 田产纠纷与奴变之祸

顾氏是江东世族，家底殷实，田产很多。但自崇祯末年，祖父蠡源公顾绍芾和堂兄顾遐篆先后去世，以致家道中落。但是国家的赋税还得交，亭林出于无奈，只好把蠡源公留给他的八百亩田产，抵押给当时昆山城里的大户人家——叶氏，来维持全家的开销。

叶氏主持家务的叫叶方恒，他是昆山城有名的劣绅，字嵎初，明崇祯间举人，入清后，考中顺治进士，任济宁道僉事等职。

当时亭林将自己名下的八百亩田产抵押给叶方恒，而抵押的钱，只有田产实际价值的一半，价钱是压得比较低的。后来，亭林要赎回这份田产的时候，叶氏却扣押了其中一部分田产，只还给亭林十分之六左右。亭林每次去讨，他都借故拖延。两年当中，先后上门讨了上百次，叶氏推三托四，故意刁难，就是不肯归还其余的田产。

明朝灭亡以后，叶方恒仗着他父亲和伯父的势力，乘机掠夺乡邻鱼肉百姓。叶家的田产紧靠着顾家的地块，他看见顾家门庭衰落，就蓄意想吞并顾家的田产，霸占顾氏抵押剩余的田产。这时候，顾亭林的嗣母刚刚去世，清兵到处抓抗清义士，他只好隐居山中，不敢轻易出来，对于田产被占的事情，只得搁下来。亭林的同学、朋友都为他打抱不平，主动帮他去讨，毫无结果。时间长了，大家都认清了叶氏蓄意鲸吞顾氏田产的野心。

正在这个时候，亭林家的一个世仆名叫陆恩的，得罪了主人。得知此事，叶氏想出了一个毒招，他用重金买通陆恩，指使其告发亭林“通海”。所谓“通海”，就是指当时明朝遗民连络南明政权和郑成功抗清部队。亭林暗中一直与抗清志士有联系，本来已经有“通海”的嫌疑；如果被告发出来，被定为“通海”的罪名，在当时情况下必死无疑。没料到这个计划还没有实行已走漏了消息，亭林得知后大吃一惊，想不到叶氏居然使出如此狠招，更想不到恶奴陆恩如此的歹毒。于是亭林决定先发制人，他亲自率领一班亲戚朋友，把陆恩绑了起来。亭林历数了陆恩叛主的罪行，宣布以家法重治，把恶人陆恩沉到荷花池里淹死了（“沉塘”是族法宗规的一种处罚）。

同谋一听陆恩被淹死了，连忙报告叶氏。叶方恒哪里肯就此善罢甘休，他扬言要跟亭林打官司，告他“无辜杀奴”之罪。陆恩的女婿也跑到叶家，哀求叶氏为他丈人申

冤理枉。他们密谋之后，私自捉住了亭林，把他囚禁在陆恩女婿家里，并胁迫亭林自裁。叶方恒又用二千两银子贿赂昆山县官，要治亭林一个死罪。

形势非常危急！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亭林的朋友归庄等人，纷纷出手相救。归庄先是请地方上的老前辈出面打圆场，希望两家和解。可是叶氏出尔反尔，坚决要置亭林于死地。归庄立即写信给叶方恒，劝说他不可动杀人之心，但是叶氏仍然不肯放亭林。无奈之中归庄只得求救于常熟的钱谦益。钱谦益，字牧斋，是原明朝的礼部尚书，清兵南下，他不听夫人柳如是的劝告，失节投降了清朝，授礼部侍郎，任职五月后回家乡闲居。得知这一事件之后，钱谦益对归庄说，只要亭林肯做他的门生，他愿意一力相救。归庄知道亭林最看不起投降派，是决计不肯答应做他们生的。但是事关亭林性命出入，担心一旦失去机会，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因此他私下替亭林写了一份投门书。事后，亭林得知此事，急忙去讨还，没能拿得回来，亭林写了一份声明，贴在大街上，自陈缘由以讨清白。钱谦益听说后，笑笑说：“顾宁人真是太急躁了！”

在众人的奔走下，总算把亭林从仇家的手里救了出来。等到对簿公堂，叶氏早就买通了苏州府的大小官员，准备判亭林无辜杀奴。苏州府的宪副虽然与叶氏有交情，但是也心知此为一个冤案；又知道昆山县里的官吏，已被叶家买通；但是，更怕照叶氏要求来判案，会因裁判不公

引起公忿，十分麻烦，所以就把这个官司转移到松江府去审理。在好友路泽溥等人的鼎力相助之下，松江府判亭林杀有罪之奴，稍稍处罚一下，这场官司就算结了。

叶氏得知判决结果，十分恼怒。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暗中指派了刺客，跟踪亭林。刺客一直盯梢跟到南京城，在南京太平门外，刺客用暗器击中亭林，亭林头部受伤从驴背上滚落下来；刺客刚想上去杀害亭林，正巧过路人上前救助，亭林才算没有遇害。与此同时，叶氏又指派顾家的叛奴及其同党，纠集了数十人，乘亭林离家的时候，把亭林老家抢劫一空。

亭林在南京养伤尚未痊愈，又得讯被人劫了老家，觉得江南已经无法呆下去了。他不止一次地在诗里说“丈夫志四方”，“毋为小人资，委肉投饿虎”。于是，决定“浩然有远行”，离开江南，到北方去。

第三章 文化苦旅

如果设身处地想一想，顾亭林在当时特殊的年代，一个人抛妻舍家背井离乡数十年，吃尽千辛万苦，尝遍酸甜苦辣，跋涉万水千山，游历壮丽山河，写下不朽之作，难道这不就是一次真正的“文化苦旅”吗？

第一节 浩然北上

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的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有一个人踏着晨曦的薄雾，匆匆地来到钟山下。那人的行囊十分简单，他一刻不停直奔孝陵，拜谒完毕之后，仍然在门前徘徊不定，不时地回头瞻望，依依不舍。此时天光渐渐放亮，初升的太阳隐隐约约映照在高高的城墙之

上，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回过头径直向长江边渡江往北而去了。

那人就是顾亭林。

此次北上对他来说是一生中最大的抉择。临行之前，亲朋好友们都来相送，这些同学朋友和他的交往短则几年，长则十几、二十年，而交往时间最长、交情最深的当属同乡归庄。酒过三巡之后，大伙儿一致邀请归庄为顾亭林的北上作个序以壮行，归庄感慨万分，即席写下了著名的《送顾宁人北游序》。序中指出，亭林这次离开家乡，难道会和历史上的伍子胥逃到吴国、范雎投奔秦国一样仅仅为了另投他主吗？显然不是。他认为亭林此番出游，是他人生的一个新起点，从此他可以有可能会登临名山涉足大川，游历华夏中原，从而使他的志向更阔大，使他的名声更响亮，因此怎知道亭林眼前的困难，不会成为他闻名天下的开始呢？众人听罢为之慨然。

亭林此番一个人离开家乡，北游的一路上会遇到许多关隘、州府，如果不说明出行的目的理由，也会遭致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考虑到亭林是饱学之士，从二十七岁起就发愤编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惊隐诗社”的朋友们早几年就为亭林准备好一份《公启》，这种“启”相当于一种私人介绍信，这封名为《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的全文如下：

东吴顾宁人，名炎武。驰声文苑，垂三十年。其高祖

刑科给事中讳济，累疏直言，载在武、世二庙实录；曾祖南京兵部右侍郎讳章志，历任藩臬京兆及掌南兵，疏更舛政，苏军卫二百年之困；本生祖左春坊左赞善讳绍芳，嗣祖太学讳绍芾，兄孝廉讳缙，并以诗文为海内所宗。嗣母王氏，未嫁守节，奉旨旌表贞孝，及闻国变，不食而卒，天下称为贞烈。宁人年十四为诸生，屡试不遇。由贡士两荐，授枢曹，不就。自叹士人穷年株守一经，不复知国典朝章、官方民隐，以至试之行事而败绩失据。于是尽弃所习帖括，读书山中八九年，取天下府州县志书及一代奏疏文集遍阅之，凡一万二千余卷；复取二十一史并实录，一一考证，择其宜于今者，手录数十帙，名《天下郡国利病书》。遂游览天下山川风土，以质诸当世之大人先生。昔司马子长遍游四方，乃成《史记》；范文正自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若宁人者，其殆兼之。今且北学于中国，而同方之士知宁人者，敬为先之以言：冀当世大人先生，观宁人之文，以察其志，而助之闻见，以成其书。匪直一家之言，异日天下生民之福，其必由之矣。

信中介绍了亭林的家世，极力推荐其才学，声明亭林此番出行，主要目的是为了考察北方，探讨学术，著书立说，希望征得各方及有识之士的支持。在这份介绍信上，亭林的许多朋友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们依次为：王猷定、毛骥、顾有孝、王潢、张恣、潘恂章、顾梦麟、陆圻、吴炎、杨彝、黄师正、汤溥、万寿祺、杨瑀、王锡阐、方文、

归庄、陈济生、丁雄飞、吴任臣、戴笠等二十一人。

四十五岁的亭林，怀揣着这份《公启》，开始了他后半生漫长的旅行生涯。

第二节 结交天下志士

关于顾亭林北游的目的，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观点，最主要有“避祸”说，和“抗清”说。本书认为，导致亭林北游的直接原因是叛奴事件，以及叶氏的追杀，为了保存自己，亭林必须离开家乡；而北游的公开目的是“征天下书籍”，这件事早在叛奴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确定下来，朋友们数年前为他写的那份《公启》就是明证。当然，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遗民，不排除他北游期间想联络抗清志士，等待时机，图谋恢复明室。他在六十八岁庚申元旦自作一联云：

六十年前二圣升遐之日；

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

可见他到晚年，仍对明朝忠心耿耿，个中的心态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单执一种说法，可能有偏颇之处。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亭林在北方又结交了一大批遗民朋友，以下介绍亭林结交各方志士的情况。

亭林北游先是来到山东省，他在山东一带结识了许多

明朝的遗民。

进入山东之后，他首先到了莱州府的掖县，在那里访到了赵氏兄弟。赵家是当地的大家族，明万历年间赵焕、赵耀、赵灿人称“三凤”，明清之际赵士哲、赵士宽、赵士完、赵士冕等，又有“五龙”之号，据说赵氏兄弟也是复社的成员，后来在山东也组织集社。在那里，亭林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在掖县，亭林还结识了任唐臣。唐臣字子良，他给亭林看了任氏的族谱，请他作《莱州任氏族谱序》。亭林在他那里借到了宋朝吴才老写的《韵补》一书，这本书过去“仅见于后人之所引，而未得其全”，没有想到在任唐臣家里看到了原本，这对于正在从事音韵学研究的亭林真是喜出望外。经过研读，他发现吴才老对古今声韵的审定和安排，一半是符合实际的，另一半就不太符合。为此亭林撰写了《〈韵补〉正》。从莱州到即墨后，他又访问了黄家，并为主人黄朗生作《劳山图志序》。正是因为这次与黄氏的结识，才引起了十年以后的济南“逆诗”案，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到了济南之后，亭林就与处士徐东痴交往。徐夜，字东痴，号稽庵，明诸生，山东新城人。徐夜的母亲在战乱之中惨遭身亡，他既悲故国灭亡，又痛母亲惨死，飘流到江苏、浙江、江西，经常面对名山大川嚎啕大哭。在江西渡浔阳江时，他把所作的诗稿，都投入了水中。他的诗写得非常好，同乡人王士禛向他索要诗稿，被他回绝了。或

许因为有过相同的遭遇，徐夜遇到亭林，就象俞伯牙见到了钟子期一样，一谈就十分投缘。徐夜向亭林吐露自己的心情，并书约亭林同游黄山，诗中说：“故国千年恨，他乡九日心。山陵余涕泪，风雨罢登临。”他还建议亭林去昌平谒天寿山明十三陵，寄托故国之思。

不久，亭林又结识了张尔岐。张尔岐，字稷若，号蒿庵，山东济阳人。他的父亲张行素，在清兵南下济南的时候，手刃清兵数人，后来清兵反扑，遇难了。“蒿庵”之号，是他在入清以后改的。结识张尔岐是一个相当偶然的时机。一天，亭林到济南，路过山东通志局门口，就进去随便看看，正巧里面有人在主讲《仪礼》，只见听课的人个个聚精会神伸长了脖子，那讲的人有声有色有条不紊滔滔不绝。亭林驻足一听，大吃一惊，心想《仪礼》这么深奥难懂枯燥乏味的学问，到了这个人的口中，居然鲜活了起来，这是何等好的学问！于是他就找了个地方坐下来慢慢听。讲演结束了，他向在场的听众打听主讲者是谁，人家就告诉他：这就是咱们本地的句读先生，叫张尔岐。第二天，亭林非常恭敬、非常礼貌地登门拜访，张尔岐听说是大名鼎鼎的顾亭林先生造访，肃然起敬，两人一见如故，定下了莫逆之交，他后来成为亭林学术上的一位诤友。他死后，亭林作《哭张尔岐》诗。

在德州，程正夫请亭林小住他家。程正夫，名先贞，山东德州人，工诗，尝官工部员外郎，后辞官归隐，著有

《海右陈人集》。他与亭林交谊甚笃，两人互赠诗文。他曾经和好友李紫澜请亭林到他家中讲学，讲的内容是《易经》。程正夫去世时，亭林亲赴德州送葬。

亭林游曲阜，结识了颜光敏。颜光敏，字修来，又字逊甫，号乐圃，自称颜回六十代孙，山东曲阜人。著有《乐圃集》。也是亭林在山东的好朋友。后来，亭林下济南狱时，他奔走最力。

顾亭林除了在山东结交了一批遗民以外，另外又在山西、陕西一带结交了一些重要朋友。

亭林五十一岁的时候，开始有西北之行，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西北地区。在太原，他寻访到了名士傅山。傅山初字青竹，后字青主，号啬庐，别号公之它，阳曲人。明亡后，隐居在窑洞里。亭林很仰慕他学识渊博、气节高尚，在人晋以后，便经常住在他家，两人志趣相投，相互切磋。亭林这样描写他的生活，说是傅青主一直以来喜欢读《易经》，也喜欢名山大川，清晨他跨着青牛出门，黄昏竟骑着白鹿回家；他是太行山西面的一个遗老，如果春天来到他家窑洞口，就可以见到桃花开放，或许他会邀请你和他一起在花丛中拾草。这简直和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逸生活如出一辙。傅山经常与亭林诗歌唱和，傅山的《晤言宁人先生还村途中叹息有诗》中道：

河山文物卷胡笳，落叶黄尘载五车。

方外不娴新世界，眼中偏认旧年家。

乍惊白羽丹杨策，徐领雕胡玉树花。

诗咏十朋江万里，阁吾苍笔似枯槎。

诗句苍凉悲壮，唱出了一位遁迹黄冠的明朝遗民的万般感慨，亭林步其韵和了两首，题为《又酬傅处士次韵》，今录其一：

愁听关塞徧吹笳，不见中原有战车。

三户已亡熊绎国，一成犹启少康家。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

待得汉廷明诏近，五湖同觅钓鱼槎。

这是亭林最著名的诗歌之一，特别是诗中“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两句脍炙人口，慷慨昂扬的诗句体现了这位大学者“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坚强决心。

在富平，他与李因笃相遇定交。李因笃，字子德，一字天生，山西洪洞人。他精于经学，著有《受祺堂集》。他与亭林的关系最密切，尽管亭林比天生年长十八岁，但两人亲如兄弟情同手足。亭林作诗赞他：“忆昔论交日，星霜一纪更；及门初拜母，让齿忝为兄。”亭林在《音学五书》的写作过程中，经常与李天生一起探讨古音，书中就收录了亭林给李天生的一封信《答李子德书》，这封信共三千五百多字，这封信指出了先秦人作诗协声之道与唐代及以后之叶韵规律的不同点，是一篇重要的古韵学论文。同时书中，还不时的插入“李因笃曰”的点评，大多是对该书重要内容的解释或补充。因此，亭林称李天生为“康

成、子慎之辈”，康成即郑玄，子慎即服虔，都是东汉的大学者。有一次，亭林对傅青主说：“今日文章之事，当推天生为宗主。”

亭林经过华阴县访问了那里的名士王宏撰。王宏撰，字文修，一字无异，号山史。明诸生。著有《易象图述》、《山志》、《砥斋集》。王山史是亭林晚年非常密切的朋友，他们俩的身世差不多，亭林的曾祖是南京兵部右侍郎，而王山史的父亲也担任过这个职务，共同语言自然不少。王山史交游很广，亭林评价为“关中声气之领袖”。后来他们一起去祭扫昌平鹿马山下的明思宗陵墓，王山史还因此自号“鹿马山人”。王山史受亭林的影响不可谓不深，亭林作为一个南方人在北方游历了二十五年，而王山史是北方人，到其中年以后，就效法亭林，经常到南方去游历，也结识了大江南北的许多文人，所以他的文名也非常高。

亭林到周至后，就去访问了青年学者李中孚。李中孚，名颙，学者称二曲先生。他与李天生、王山史三人，合称为“关中三友”。他比亭林小十四岁，从小家境贫寒，无力就学，完全通过自己刻苦自学，成为关中第一流学者。明亡时年仅十八岁，他便开始隐居在窑洞里。李中孚平时不见客，但亭林来访，他热情接待，一见如故。亭林非常钦佩他威武不屈的遗民气节和“有名不如无名，有位不如无位”的精神。

亭林回到太原，又遇到了清初最著名的学者朱彝尊。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人。他与李因笃、潘耒、严绳孙，合称为“四布衣”。亭林在太原时，他也在西北游历，当时只有三十七岁。那年三月游山西风峪，与亭林相遇，互赠诗歌。亭林在诗中说：“词赋雕镌老，河山骋望频。末流弥宇宙，大雅接斯人”，盛赞他的词赋精当，文章雅洁。

以后，亭林又结识了申涵光，他是孙夏峰的弟子。申涵光，字鳧盟，直隶永年人。他是著名的明遗民，经他介绍，五十二岁的亭林亲往河南辉县，拜访到了孙夏峰老先生。孙夏峰，名奇逢，字启泰，号钟元，河北容城人。他是清初诸儒中最年长的一位学者，亭林称其是“河北学者之宗师”。清兵入关，他督率兄弟亲戚，固守容城，清兵久攻不下而去。清朝建立后，他就率领子弟门人到五公山避乱，远近闻风来依的人很多。他虽是明末王学一派的，但是他并没有象晚明学人那样空谈心性，很注重文献。两人相见后畅谈古今，都以为是人生大幸，孙奇逢感叹“世路荆榛”，亭林却说：“华山有地堪作屋，相与结伴除荆榛。”亭林积极向上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他。

第三节 经营与垦荒

顾亭林长期在北方游历，一开始相当艰苦。据他自己

回忆：刚离开江南北上时，那年秋天，在淮北正好下了大雨，发生了洪涝灾害。亭林只能光着脚，拼命跑，跑了二百七十里，一直跑到干燥的地方才停下来，发现自己两只脚已经被水泡得全部肿了。后来，在山东都靠朋友接济，在北京一带也是由朋友帮忙。当时，亭林是一个人，因为穷，并没有仆人跟随。在野外，实在没有吃的，就吃路边的野菜充饥，这时的他才真正明白三十多年前嗣祖蠡源公说“你他日得食草根就幸运了！”这句话的深切含义，他决心再艰苦也要坚持活下去。

以后亭林回了一趟南方，迫于生计，他把家产全部变卖，有了一点本钱，和商人合伙做生意。后来，大概是赚了一些钱，所以“壬寅以后，历晋抵秦，于是有仆从三人，马骡四匹。”当然二马二骡也是友人相赠的。与亭林合伙做生意的人是山东章邱商人谢长吉。谢是一个奸商，他设法把亭林的本钱全部“套牢”，等亭林西北游历回来，他就向亭林两手一摊，说是做生意赔了，想吃没亭林的钱。幸亏亭林跟地方长官有点交情，官方出面调解了此事。本钱虽然没法追回来，但是谢家只好把一千亩田作为抵债补偿给了亭林。因为这次与谢长吉结下了冤，所以几年以后，在谢的唆使之下，最终导致了亭林济南入狱。

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亭林得到了一千亩田，这块田产位于山东章邱与长白山交界一个名叫“大桑家庄”的地方。生意是做不成了，只有靠种地，反正“万物土中

生”，很快农庄里的麦子成熟了，果树也果实累累，粗粗一算，这块田产上一年可以收到一百六十两租金，从此，亭林的日常生活开销，就不用再依靠别人的周济了。

大桑家庄经营的成功，使亭林对于在北方开发土地有了极大的兴趣。就在第二年，亭林考察山西以后，遂决定与李因笃等二十多人，共同进行垦荒。

当然进行垦荒的前提是清政府的许可。由于多年自然灾害、明末农民起义以及清兵入关的战乱，造成中原一带人口锐减，土地荒芜。面对经济凋蔽，人口不足，满清政权颁布了恢复生产奖励垦荒的政策。条例上说“凡州县卫所荒地，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有主者，令原主开垦，官给牛种，三年起科。”1649年，中央政府又要求各地官员对流亡到本地的人，不论其原籍在何处都要加以招徕，允许他们开垦无主的荒地，并把招徕人口的多少、垦荒面积的多少，作为官吏奖惩升迁的依据。清政府的这些措施，有利于生产力的恢复和社会的稳定，成为它巩固政权的有效手段。

亭林看到了这种政策的变化，利用现行的政策，开展一些垦殖活动，正合他意。一方面可以增加收入，以补贴其出行的开支；另一方面，在山西可以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方便于同志朋友的沟通与来往。于是，他决定与李因笃等二十来个朋友一起进行垦荒开发，地点选择在五台山麓的雁门。他在给学生潘耒的信中说：“近则稍贷资本，于雁

门之北、五台之东，应募垦荒，同事者二十余人。”从“应募”二字中，可以看得出当地官员对招徕垦荒之事比较重视，地方性政策可能比清政府的政策还要来得优惠，使得亭林等人竟敢凭贷款来进行开发。

亭林等一班人在那里“辟草莱，披荆棘，而立室庐于彼。”说明垦荒生产是相当艰苦的，而且“其地苦寒特甚”，对于一个南方人来讲，非常不容易。当然等到房屋建造好了之后，大家的心也就定了下来。但是，北方人大多数不擅长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甚至对于如何开渠、如何灌溉都不会，更不用说利用水力来进行生产，所以不得不到南方去聘请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由于雁门垦荒的经历，亭林对西北地区经济的开发有了新的认识，他得出以下结论：“大抵北方开山之利过于垦荒，畜牧之获饶于耕耨。”据说通过这次垦荒，使亭林的资产“累致千金”。因此他大胆地推论说：“使我有泽中千牛羊，则江南不足怀也。”他还鼓励潘耒一起参与开发：“文渊、子泰并于边地立业，足下倘有此意，则彼中亦足以豪。”亭林在西北地区进行开发，想到了要和汉代人文渊、子泰比照。文渊就是东汉的名将马援，曾任伏波将军，马援曾经对门客说：大丈夫的志向应该是，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他还说：男子汉死要死得壮烈，死在边关野外，马革裹尸才算英雄。子泰是汉末的田畴，因为当时兵荒马乱，田畴率领同族的人避居到徐无山中，进行开发。老百

姓都来投奔他，几年以后人口达到五千户。曹操北征乌桓，田畴派人为其作向导，立下了功劳。曹操封他为亭侯，田畴辞谢，他说：我怎么可能把我们这个关塞来交换赏赐呢？

亭林是个坐不住的人，史书称他“以游为隐者”。他曾讲到自己这么多年所到的地方，停留时间多不超过三个月。当他看到雁门垦荒已经粗具规模，就把具体的经营管理事务交给了自己的门人，而自己又开始了长途旅行。

除了章邱经营和雁门垦荒，还传说顾亭林创办山西票号。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一带的票商，真正兴盛在清代中叶，因此对这一说法有待于进一步考证。这里摘录几条记载以备参考：

其一，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相传山西票号由亭林创办，一切组织规则，皆其手定。后人率循之，遂成二百余年金融中心。此事不见前贤所作传，未知确否？”

其二，据徐珂《清稗类钞》讲：“相传明季李自成掳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其号中规则极严，为顾炎武所订。遵行不废，称雄于商界者二百余年。”

其三，章太炎《书顾亭林轶事》云：“近闻山西人言：亭林尝得李自成窖金，因设票号，属傅青主主之。”

前人说亭林日常生活“自奉极俭”，但是，他“善于

治财，故一生羁旅，曾无困乏”。恐怕主要还是依靠垦殖。

在北方，亭林亲眼见到老百姓因多年战乱，流离失所，社会混乱的程度简直难以想象。他在给外甥徐元文的信中说：“关辅荒凉，非复十年以前风景，而鸡肋蚕丛，尚烦戎略，飞刍挽粟，岂顾民生！至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八升，赴营千里……”蛮横无理的清军到处残害人民，鱼肉人民，驱使人民，百姓们实在无法承受，于是“强者鹿挺，弱者雉经”，或者“阖门而聚哭投河”，或者“并村而张旗抗令”。对此，亭林十分同情，他说：“不忘百姓，敢自托于鲁儒”，要在京中当大官的徐元文予以关注。

第四节 济南下狱

好景不长，顾亭林在五十六岁的时候卷入了一场“文字狱”。清朝大兴文字狱是为了加强其异族封建专制集权统治，所进行的文化清洗。当时，只要是清统治者发现某个读书人存在着排满思想，一些人在集会上发表反清言论，那怕只是文人的一句口误，甚至仅仅凭一点怀疑，都会采取最残酷的手段进行镇压。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字狱，比以往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严酷，称得上登峰造极。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江南就发生了著名的“明

史案”。事情是这样的：浙江湖州有个富户叫庄廷鑑，本人没有什么学问，他眼睛瞎了以后，听说战国时代左丘明瞽目而著《左传》，他也想要青史留名，所以决定私人出资编修《明史》。他聘请江南一带有名的学者为他编写《明史》，其中有亭林的两个好朋友“惊隐诗社”的吴炎、潘柽章，列入了参阅姓名中。其实庄廷鑑当时也曾邀请亭林到过他家里商议写史的事情，只是亭林看不起他，认为这个人不学无术，不过附庸风雅而已，就离去了，所以在庄氏的修史名单里没有亭林的名字，算是与这场灾难擦肩而过。

由于这本《明史》是以明朝宰相朱国桢编写的《列朝诸臣传》稿本为基础，再补上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史事，其中不免有贬斥满清的“违碍”的话。有人告发了这件事，清廷下令把已经入土的庄廷鑑开棺戮尸，凡是与这本书有关的写书的人、刻书的人、校阅的人、卖书的人、藏书的人统统处罚，遇害者一共七十二人，另有数百人被充军边塞。公堂上，有的人不敢承认与自己有关，想求得开脱的机会；只有吴炎慷慨大骂，官吏受不了谩骂，把他一顿拳打脚踢，打倒在地；而潘柽章因为家中还有老母，也不想连累妻子兄弟，既不骂也不辩解，沉默以求速死。当年五月，二人死于杭州弼教坊。

那年秋天，正在山西汾州游历的亭林，听到这一噩耗，悲痛万分，当即在旅舍中遥祭两位好友。潘柽章的弟弟叫

潘耒，改名换姓为吴开奇，一路北上投奔亭林，后来成了亭林的门生。

这场“明史案”虽然没有直接牵连到亭林，但是遭受了损失。当时吴、潘两人自己所著的《明史》已成稿若干卷，来不及脱稿就被官府付之一炬。潘耒曾向亭林借有关明史资料一千多卷，其中包括亭林曾祖蠡源公当年抄录的邸报等珍贵资料。本来亭林也想凭这些资料编写一部有关明朝的历史著作，可惜这些书籍资料在这场文字狱中全部损失了。亭林感到非常痛心，他曾经对潘耒说：“吾昔年所蓄史事之书，并为令兄取去。令兄亡后，书既无存，吾亦不谈此事。”所以亭林明史著作仅《圣安纪事》、《明季实录》等几种行世。

浙江“明史案”之后，1665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狱案”。事情曲折，要从十年以前，亭林到山东即墨讲起。即墨黄家是当地的乡绅，他们家的祖辈在明朝当过御史，黄培在明末做过锦衣卫都指挥使；入清以后，又有黄坦任浦江县知县，黄贞麟任凤阳府推官。可是后来黄家发生了“奴变”。他家的“奴变”同亭林家发生的陆恩叛主稍有不同，陆恩属于叛投他主，投靠亭林的仇家，而陆恩本人的身份地位没有发生变化；黄家的“奴变”，则侧重在主奴的名分之争。这个家奴叫姜元衡，姜家投靠黄家以后随姓黄，黄宽、黄瓚、黄元衡祖孙三代都是黄家的世仆。到了黄元衡（即姜元衡）这一辈，他借用高密县的籍贯，考上

了举人，后又中了进士，入了翰林院，当了大官。当官之后，他就想要复姓归宗。要恢复姓姜就必须征得黄家的同意，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发生了矛盾。这时候，清朝正大兴“文字狱”，他就乘机告发黄培祖孙三代十四人曾经刻过、藏过所谓“悖逆”的书籍，并告黄培拒不剃发，想以此扳倒黄家，达到反仆为主的目的。案发之后，山东巡抚亲自过问此案，但是由于证据不足，这场官司审理了三年多，搁下来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冒出了一本《忠节录》。该书原名《启祯集》，是苏州人陈济生所辑。陈济生是谁呢？他是亭林的姐夫，字皇士，也是“惊隐诗社”的成员。他编辑了《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录》十卷，这本书选辑的目的是要补钱谦益编的《列朝诗集》所未备者，选择标准“以人为重，人以节义为主”，其中分作三大类，因阉祸而死的为一类，乙酉殉难的为一类，还有起义遁隐的为一类。不但有诗还有传略，书前面还有归庄的序文。照理归庄也会有所牵连的，幸亏姜元衡看到的传抄本，既无序又无目亦无诗，仅有此书传记部分的一百余叶，所以归庄没有被牵连进来。

姜元衡告发顾亭林拿了这本《忠节录》抄本到黄家刻印成书，其中有一篇《顾推官传》，文章中提到“晚与宁人游”、“有宁人为《状》”等说法。这样就把亭林牵连了进来。当时，明末遗民们充满亡国之后的苦闷心情，其中

有一些人组织诗社，比如“惊隐诗社”，在政治上采取与清廷不合作的态度。陈济生编选的《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即所谓《忠节录》，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其实同样的工作亭林本人也做过。亭林门人李云霁在《与人论亭林遗书笺》中谈到：“先师（指亭林）当日著作甚富，即以晚（指李云霁自己）所见而言，尚有《岱岳记》四卷、《熹宗谅阴记事》一卷、《昭夏遗声》二卷（原注：昭夏者，中夏也；选明季殉节诸公诗，每人有小序一篇，系霁手录。）”可见亭林选辑的《昭夏遗声》，用意与陈济生编的书一样。因此，清朝的文字狱找亭林麻烦，是并不偶然的。

姜氏翻出这本脚本，等于“冷镬子里爆出了热栗子”。这件案子要重新开审，官府发出通告要所有涉案人员都向当局说清楚。于是，本来这件与亭林不相干的事情，变得有关了。1668年春，亭林在北京听说后，就立即动身赶到济南府去澄清事实。对此，归庄在给亭林的信中说：“自诣狱，不惟举动光明，揆之事理，亦自宜尔”。哪知到了济南，官府也不问话，先把亭林关了起来。在监狱里，他只能“日以数文烧饼度活”，其间山东还遭受以郟城为震中的特大地震，幸亏济南没有太大震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在公堂之上，亭林一口予以否认，而姜元衡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文章中的“宁人”就是亭林，山东巡抚也难以判断。就在十分危急的关头，亭林的外甥徐元文，

当时已在京中为官，暗中通过关系向山东巡抚打招呼；同时颜光敏等一班朋友都出手相助，设法营救。朱彝尊正好刚到山东，担任山东巡抚刘芳躅的幕僚，他的朋友在赠别诗里说“讼庭尚有南冠客，莫向燕台思故人”；另外好友富平李天生，也赶到山东，“三千里赴友人之急”。由于各方救助，从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三月到十月，亭林在济南府中蹲了七个月大牢之后，终于重见天日。

这场官司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呢？据亭林嗣子顾衍生说是谢长吉。上节提到，亭林曾和章邱商人谢长吉合伙经营，谢长吉欠了亭林债不肯还，亭林与之对簿公堂，谢长吉才不得不把大桑家庄一千亩田产作抵偿，因此耿耿于怀，出点子指使姜衡告发顾亭林违禁刻书。朱彝尊对这件事很了解，他在《静志居诗话》中说：“亭林兵后尽鬻其产，寄居章邱，别治田舍，久而为土人攘夺”，“土人”即谢长吉，案狱就从他身上引发。案子了结之后，亭林就把这份田产暂时挂到了他的外甥徐元文的名下，由徐元文代管；七年之后，亭林在即墨县令魏某的帮助下把这块田产卖给了别人。

第五节 行万里路，破万卷书

归庄在《与顾宁人书》中说：“使兄不遇讼、不避仇、

不破家，则一江南富人之有文才者耳，岂能身涉万里，名满天下哉！”讲得很有道理。但是，“行万里路，破万卷书”，历来是中国读书人的人生追求，亭林后半生就是这样实践的。全祖望在《亭林先生神道表》中记载：

自是往还河北诸边塞者几十年。凡宁人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扼塞，即呼老兵退卒，询问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经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

潘耒《日知录序》说亭林：

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出必载书数簏自随，旅店少休，披寻搜讨，曾无倦色。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也。

而亭林的友人王山史在《山志》中称：

（亭林）留心经学，胸中富有日新，不易窥测。……居恒自奉极俭，辞受之际颇有权衡。四方之游，必以图书自随。

其实亭林的行程何止万里，从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中间的十年中，他的行程已经有二三万里，阅读了上万卷书，在此期间，他完成了《肇域志》的编纂工作，同时也完成

了一部分《日知录》的条目。晚年定居华阴，亭林总结他二十多年中的行程，说“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

古代中国称“九州”，在九州之中，亭林游历了哪七州呢？他到过江苏、浙江、山东、山西、河北、河南、陕西七省，以及东北边塞一带。亭林所讲的七州，是根据《禹贡》九州来说的，当时的江苏和浙江属于徐、扬二州，河北和东北边塞属于冀州，山东属于兖州，山西属于青州，河南属于豫州，陕西属于雍州，所以他所游历的七州就是冀、兖、青、徐、扬、豫、雍。仅荆州和梁州，亭林没有涉足。在游历各州省的同时，亭林留下了一系列著作，如《山东考古录》一卷、《京东考古录》一卷、《建康古今记事》十卷、《北平古今记》十卷、《历代帝王宅京记》二十卷、《营平二州史事》六卷等一大批历史地理学专著。

在五岳之中，亭林曾经登临了四岳，就是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东岳泰山是他生平第一次所登临的大山。他写了一首《登岳》诗，此外他还考证了泰山无字碑等古迹，并著有《岱岳记》八卷。他登临的第二座名山是北岳恒山，他写下了著名的《北岳辨》，这篇文章列在他的文集的卷首，足见文章的分量；另外还有五古诗《北岳庙》。他第三回登的是西岳华山，有咏《华山》诗；他在华山上遇到了明末太监范养民，为之作散文名篇《复庵记》。他以六十五岁的年纪登临了第四座名山中岳嵩山，他写下了《嵩山》、《少林寺》好几首诗，他在

《少林寺》中有“寄语惠场流，勉待秦王至”诗句，耐人寻味。亭林登临四岳，目的在于浏览祖国大好河山，激发爱国热忱，抒发豪情壮志。

除了名山大川，亭林去得最多的是明孝陵和十三陵。在江南的时候，他就曾多次拜谒南京明孝陵；到北方的第三年，他听取了徐夜的建议，赶到了位于昌平州的天寿山十三陵。在拜谒这些明代帝陵之后，亭林根据实地考察，写成了《十九陵图志》六卷、《万岁山考》一卷、《昌平山水记》二卷等。此外，他还去过绍兴的大禹陵、萧山的宋六陵等地。他瞻仰历代帝王陵墓，目的无非是从宋、元、明、清的朝代更替中，寻找亡兴的原因，不忘复兴中华故国。

亭林每一次出行，都有一定的目的性，他说：“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他在北方一心想要遇到“异州贤”，所以一直在“山川恣搜寻”。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夏，郑成功、张煌言率兵从崇明入长江，逆流而上，经镇江，一路打到南京城下。张煌言扼守芜湖，分兵攻占了徽宁、宣城、旌德、舒城、溧阳等地，东南一带大为震动。但是，郑成功久攻南京不下，八月被清兵击溃，败退厦门。亭林闻知郑成功进攻南京的消息，他当即上路南归，可是当他到扬州时，北伐已失败，只得抱憾重新北上。次年又回到南京，谒孝陵，作《重谒孝陵》诗，有“问君何事三千里？春谒长陵秋孝陵”的诗句。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

年)吴三桂发动了反清的兵变,起兵云南,亭林在《哭归高士》中说:“碧鸡竟长鸣,悲哉君不闻”,欣喜惋惜之情溢于言表。从此他决定西行,并选择险要的华阴“安营扎寨”。亭林晚年,专心写作《日知录》,“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足见其用心良苦了。

第六节 虚怀若谷,广师学友

梁启超认为凡大学者必要的态度有二:一曰精慎,二曰虚心。亭林就是最能表现这种精神的人,学问越大越是谦虚。他的《日知录》,好友阎百诗驳正若干条,他一见便欣然采纳;他的《音学五书》,经张力臣修改达一二百处。他说“时人之言,亦不敢没。君子之谦也,然后可以进于学。”这种态度,永远值得后世学者学习。汪琬在《与人论师道书》中提到:

当世未尝无可师之人,其经学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顾子宁人、李子天生。

汪琬,字茗文,号钝庵,晚号钝翁,学者称尧峰先生。江苏苏州人,清初进士,曾任刑部郎中,后归隐。在他看来,经学方面值得推崇和学习的只有顾炎武和李因笃两位。由于汪琬是京城里的要员,说出的话非常有份量,影响很大。

这话传到亭林耳里，他十分谦虚地说：“自揣鄙劣，不足以当过情之誉。而同学之士，有苕文未知者，不可以遗也，辄就所见评之。”接着亭林就列举出了十位可师之人，说：

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
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
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
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
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
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
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
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
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
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

文中连续使用了十个排比句，列举了十位名家，他们是：王锡阐、杨瑀、张尔歧、傅山、李颙、路泽浓、吴任臣、朱彝尊、王宏撰、张弼。文章中连续用了十个“吾不如”，表明亭林的谦虚品格和宽广胸怀。这十位名家都不是达官贵人，对此亭林解释道：“至于达而在位，其可称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议也。”非常含蓄地表明了自己对那些在朝者的轻蔑，谦卑之中透露出清高的骨气。

这十位友人，都是亭林的良师益友。以下逐一介绍：

王锡阐，字寅旭，号晓庵，江苏吴江人，著名天文学家。王锡阐少年时博览群书，尤精历象之学。明亡后，他

曾投河自杀，想以死殉国，被人救起。后来又绝食七天，在父母强迫之下才重新进食。一生拒不仕清。朋友说他“性狷介不与俗谐，著古衣冠独来独往，用篆体作楷书，人多不能识。”“瘦面露齿，衣敝体，履决踵，性落落无所合。”作为遗民，他的遭遇与顾亭林有相似之处。王氏兼通中西历法，他“考古法之误而存其是，择西法之长而去其短”；又十分重视科学实验，经常在天色晴朗的夜晚，登上屋顶，仰观星象，以至整夜不眠，坚持几十年不间断。他首创了日月蚀的初亏和复圆方位角的计算方法，在解释行星运行轨道的原因时，作了近于引力学说的探索。他的著作《晓庵新法》是我国历史上一部有名的私著天文历法。王锡阐对亭林非常仰慕，说：“锡阐少乏师傅，长无见闻，所以不惮悉其固陋以相往复者，正欲以洪钟明镜启我聋瞽。”顾亭林虽然年长王锡阐15岁，但对他的学问品行十分钦佩，称其为“高士”。在《广师》一文中，把他列在第一位，可见其重要。

杨雪臣，即杨瑀，江苏武进人。明亡后，他隐居起来，教子读书，不应科场考试，不仕清朝。亭林很钦佩他这种隐姓埋名的操守和教子的义方。他在与杨雪臣的通信中说：之所以使我辈深深佩服先生的，在于你不一心想刻书，不求一时的虚名。尽管令郎博览经史，但不去赴科场应试，这又是今日教育子女的人所值得取法的。亭林还作诗寄赠，也称他为“高士”。

张稷若，即张尔岐。前文介绍过，张尔岐是个经学大师级的人物，长期隐居乡村。他一生著作很多，以《仪礼郑注句读》一书学术价值最高，全书十七卷，共化了整整三十年的工夫写成。亭林相当佩服他，说他“根本先儒，立言简当，以其人不求闻达，故无当世之名，而其书实似可传。使朱子见之，必不仅谢监岳之称许也。”虽然张尔岐是王阳明的传人，在学术观点上两人颇不相同，但是亭林还是很虚心地向他求教。在《日知录》中有“丧礼主人不得升堂”和“停丧”等条目，都采用了张尔岐的意见。

傅青主，即傅山。他博学多才，经史诸子以及佛道释典样样精通，能诗文，善书画，又精通医道，为百姓治病常常药到病治，被当地人奉若神明。清朝征博学鸿词科，他拒不应征。亭林钦佩傅山的人品学问，他曾教育学生潘耒说：“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虽青主读书四、五十年，亦同此见。”亭林经常与他切磋学问，有一次，亭林借宿傅家，早晨还没有起床，傅青主就喊“汀芒矣”。亭林十分奇怪，不明白他在喊什么，傅青主笑着说：“先生不是一直研究古音吗，怎么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呢？”亭林一想不觉笑起来，原来古音中天读“汀”，明读“芒”，所以傅青主把天亮读作“汀芒”，与亭林开了个小玩笑。

李中孚，即李颙。李中孚与亭林在思想体系上并不一致，李中孚信奉陆九渊、王阳明的“致良知”，先求于内而及乎外，突出一个“悟”字。李中孚曾直接了当地批评

亭林的学说是“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亭林为之恍然。正是这种学术交锋，使双方都有实质性的提高。后来亭林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李中孚“虽从象山入手，而近颇博览，与吾交，亦更亲于昔”。友谊越来越深，说明亭林并不自矜，李中孚也不固执，双方都取长补短。

路安卿，即路泽浓，直隶曲周人。其父路振飞，是明末名臣，曾总督漕运，巡抚淮阳。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监国、称帝，路振飞有扶翼之功；隆武政权覆灭后，他又去投奔永历帝，不料途中病故。路振飞有两个儿子，长子泽溥，次子泽浓。大哥路泽溥侍奉母亲，住在太湖西山。亭林因奴变事件被叶氏扣押的关键时刻，路泽溥出面干涉，成功搭救了亭林。路泽浓则跟随父亲到福建、广东，与清兵周旋作战。他吃尽了千辛万苦，冲破了艰难险阻，最后由于缺少支援，寡不敌众，失败了。之后他也回到太湖隐居起来。

吴志伊，即吴任臣，初字鸿征，一字尔器，号为 讷园，浙江仁和人。幼时家贫，好读奇书，曾在家乡当过师塾先生。明清易代，社会动荡，许多大户人家都纷纷变卖家当逃避战乱，有大量珍贵的书籍流入市场出卖，价钱非常便宜。吴志伊很有眼光，抓住机会大量收购，不久成为江浙有名的藏书家、学者。

朱锡鬯，即朱彝尊。自幼家境贫寒，好读古书。在他游历大江南北的时候，身边总是携带着十三经和二十一史

等书籍，遇到丛祠荒冢、破庐残碣上留有文字，都要搜集考证一番，并且抄录下来。他学识渊博，不仅精通经史，而且擅长诗词古文。后学评论说：王渔洋工诗词，汪茗文工古文，毛奇龄工考据，只有朱彝尊样样都精通。朱彝尊是浙西词派的创始人，他说，要学好诗文，一定要打好经史的根基，这样才能体察古人的意境，如果满足于写空泛粗浅的文章，是不能成为一名真正作家的。

王山史，即王宏撰。明末诸生，入清以后，他隐居读书，不问世事。他博学多才，熟悉明朝的典章制度，精通金石之学，写得一手好书法。在亭林的《金石文字记》一书中读者常可以看到“吾友王山史曰如何如何”，足见山史金石鉴赏水平之高。亭林到陕西，经常住在他家中，两人形影不离，一块考察边塞，一同吊谒明陵。他后期的文章深受亭林影响。王山史对朋友慷慨热情，著名诗人屈大均去访问他，两人诗词唱和，十分投缘，他就把自家小妹介绍给屈大均，两家结为秦晋之好。

张力臣，即张弼，号亟斋，江苏山阳人。不应科举，以卖书画为生。此人精于文字音韵之学，尤长金石考证。亭林所著《音学五书》，多次征求他的意见，张力臣认真阅读了此书，为其改正错误达一二百处，亭林都欣然采纳。此书在淮安刻板时，就由张力臣亲手写定付梓，书中的小字，则由张力臣的两个儿子分别写成，使这本不朽之作增色不少。亭林想起此事总念念不忘。

第七节 拒绝清廷征召

满清政权为了加强对汉族思想文化的控制，推行恩威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压制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另一方面，采取笼络的手段，消弭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清政府宣布，凡是明朝时考中的举人仍然有效，还可以继续参加清朝的会试殿试。除此之外，清政府还在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特开名为“博学鸿词”的恩科，吸收各地推荐的学有专长的学者和文化名人；另外，还借编纂《明史》的名义，网罗前明遗老及治史专家，促进满汉统治阶级的进一步合流，冲淡民族矛盾，达到以汉人统治汉人的目的。

亭林对于那些甘心向新主子投靠的软骨虫嗤之以鼻。他用尖刻辛辣的笔触，讽刺这些人奴颜婢膝奉迎献媚的丑态，诗中写道：

蓟门朝士多狐鼠，旧日须眉化儿女。

生女须教出塞妆，生男要学鲜卑语。

而他自己始终坚持与清朝不合作的立场，为此作了几次三番的斗争。

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熊赐履主持修《明史》。那年夏天，亭林正好小住在北京外甥徐乾学家里，一天，熊赐履设家宴邀请亭林和徐乾学出席，客人只有他们两个。

席间，熊赐履对亭林说：“顾先生是当今著名的大学者，现在朝廷命我主纂《明史》，对于前朝的事情我不是非常了解，不知先生是否能够出山，帮助我一起编写《明史》？”亭林听了此话，严正地回答道：“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矣。”熊赐履和徐乾学两人听到亭林断然拒绝，都大吃一惊。过了两年，亭林问起徐乾学，徐乾学回答说，熊赐履再也没有提起此事。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三藩之乱”平定之后，清廷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儒，要求各地官府推荐，并“护送”（实际是押送）到京城，集中候试。同乡人侍讲学士叶方霭、苏州人侍讲韩菼都想要推荐亭林，亭林知道后表示要以死相拒。他在给学生潘耒的诗中明确地表示：

嗟我性难驯，穷老弥刚棱。
孤迹似鸿冥，心尚防弋繒。
或有金马客，问余可共登？
为言顾彦先，惟办刀与绳！

的确在当时清政府的威胁利诱之下，要想拒绝荐试，没有足够的决心，是难免不被拖下水的。清朝《鹤征录》中记载所录取的五十位名儒中，就有亭林的好友李因笃、朱彝尊和他的门生潘耒等，因此，亭林能在这种情形下“超然独免”是不容易的。常熟人吴龙锡曾写诗称赞他说：“终南山下草连天，种放犹惭古史笺。到底不曾书鹤板，江南惟有顾圭年。”

与亭林一起的几个好朋友，也同样拒绝了清政府的征召。例如傅山被清政府强征，官府用门板把他抬进京城，但他躺在门板上拒绝向清统治者行跪拜礼，清廷只得作罢放归。李中孚也被地方官推举为“山林隐逸”，他力辞不就，后被强拉去京城，他又以绝食抗拒，康熙要召见他，他以死坚辞。亭林曾赞扬他的气节说：“而同志之李君中孚，遂为上官逼迫，舁至近郊，至卧操白刃，誓欲自裁。关中诸君有以巨游故事言之当事，得为谢病放归。然后国家无杀士之名，草泽有容身之地，真所谓威武不屈。”年已六旬的王山史，也被荐博学鸿词，他写信给陕西巡抚转告吏部辞谢，但没有被批准，后来被迫入京，他托病不去应试，朝廷只好放他回家。在家乡昆山，教育家朱柏庐也被官方点名要应试，但是他和亭林一样坚决拒绝出仕。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昆山人叶方霭担任明史馆总裁，主持修史之事，他也准备招致亭林，又一次被亭林回绝。在给叶方霭的信中他严正地说：

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他以无比坚定的信念保全了自己的晚节，并实践了嗣母的遗训。那些想拉拢亭林的人知道亭林不会动摇决心，也只得放弃了劝说。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从此以后，亭林再也没有踏进过京城一步。

第八节 晚年卜居华阴

选择在华阴落脚，是亭林许多年以前就有的想法，只是因为山东章邱的田产没有安置好，以及济南逆诗案的牵连，迟迟没有定下来。早在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亭林西行至山西、陕西，考察地理，了解民风，联络同志。当他进入华阴县境以后，就为华阴重要的战略地位所吸引，他在《与三侄书》中谈到华阴优越的地理条件：

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翎之便。

这种进可攻可退可守的特殊战略位置，对于亭林再合适不过了。同时，他又在那里结识了傅山、李因笃、王宏撰等人，通过与他们的交往相处之后，亭林觉得“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他在诗里说：“窃闻关西士，自昔多风尚”，这给他落脚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环境。此外，让亭林觉得可以接受的是那里的农副食品，他说“黄精松花，山中所产，沙苑蒺藜，止隔一水，终日服饵，便可不肉不茗。”在他眼里，这些食物胜过了南方的美食。

促成亭林落脚华阴是“三藩之乱”以后，吴三桂的军队攻下了长沙，派遣部将王屏藩到陕西活动，陕西提督王辅臣举兵响应，西北为之震动。亭林在这样的形势下决定

移居西北，《雨中至华下宿王山史家》一诗记载了他的旅途行色：

重寻荒径一冲泥，谷口墙东路不迷。

万里河山人落落，三秦兵甲雨凄凄。

松阴旧翠长浮院，菊蕊初黄欲照畦。

自笑漂萍垂老客，独骑羸马上关西。

亭林第二次到关西，王山史迎至潼关，他就小居在潜村王家明善堂内。后来王山史又为他建造了几间屋子，名为“顾庐”。亭林自置水田四五十亩以供晨夕。在这两年中，亭林广交秦中名儒，继续从事《日知录》写作。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那年亭林六十七岁。在他的倡导下，他与王山史等人共同筹建“朱子祠”，两年后祠堂正式动工。他在《与李中孚书》中谈及此事：“华令迟君谋为朱子祠堂，卜于云台观之右，捐俸百金，弟亦以四十金佐之。七月四日买地，十日开工，中秋后即百堵皆作。”到第二年正月竣工。

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十一月，亭林元配夫人太仓王氏卒于昆山，他令嗣子顾衍生设位祭奠，自己则临风而泣，写下了《悼亡》诗五首。这一下使他想起应该为嗣母王氏建一个祠堂。为此，亭林写信给外甥徐乾学、徐元文两人，希望他们能关心此事。

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三兄弟是亭林五妹的儿子，徐家与顾家是世交，而且也是邻居，关系非同一般。亭林

五妹，知书达理，对子女教育非常严格。徐氏三兄弟从小还得到了亭林的亲自指点，所以舅甥之间关系密切。后来三兄弟陆续登科出仕，其中徐元文中状元，徐乾学和徐秉义都中了探花，人称“同胞三鼎甲”。亭林在山东济南下狱时，得到过徐元文的暗中帮助，后来又有徐乾学的资助。在亭林的指点下，徐元文主持撰修了《明史稿》二十二卷，徐秉义完成三卷，为《明史》的完成打下了良好基础。

徐乾学被贬回昆山后，曾多次写信要迎接亭林南归故里，表示为他新筑别业，买田养老，但是亭林都回绝了。有人问亭林为啥不回老家，他说：“衰疾渐侵，行须扶杖，南归尚未可期。久居秦晋，日用不过君平百钱，皆取办囊橐，未尝求人。过江而南，费须五倍，舟车所历，来往六千，求人则丧己，不求则不达，以此徘徊未果。”虽然有年事已高、费用太大等原因，不想求人丧己，可是他真正的心思是：

昔岁孤生，飘摇风雨。今兹亲串，崛起云霄。思归尼父之轶，恐近伯鸾之灶。且天仍梦梦，世尚滔滔，犹吾大夫，未见君子。徘徊渭川，以毕余年足矣。

不久，王山史到南方游历，亭林为避开地方官府的干扰，也离开了华阴去了山西曲沃。开始住在卫蒿的绛山书院，后因城中嘈杂，又移居曲沃县城西南三里外的东韩村韩宣家的宜园。年老的亭林身体曾一度不好。

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农历正月初八，北国早

已是一片银装素裹。清晨亭林准备去拜会当地人士，仆人牵来马匹，他刚要跨上马，突然脚下一打滑，从马鞍上失足坠落到地上。众人忙扶亭林回房休息。这一摔，使亭林旧病复发，日夜呕泻不止。第二天上午，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带着无限的遗恨，在山西曲沃东韩村宜园与世长辞了。

第四章 一代儒宗

潘耒称亭林为“通儒”。何谓“通儒”？就是能够传承中华文化，贯穿古今人文，打通不同学科，开创学术门类，“开派立宗”的大学者。无论从那个方面看，亭林都当之无愧。梁启超曾高度评价说：“亭林一面指斥纯主观的王学不足为学问，一面指点出客观方面许多学问途径来。于是学界空气一变，二三百年间跟着他所带的路走去。”

第一节 三大思想家的历史命运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为代表，他们在思想上的贡献、学术上的成就，与同时代

的欧洲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相比并不逊色。他们的思想启示了近代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他们的学问开创了有清三百年的学术文化，值得世代推崇。

三大思想家共同经历了动荡变化的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时代。那时，欧洲已开始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自然科学知识逐渐传入中国。与之相反，明朝末叶，是中国封建制度走向末世的时期，皇室、贵族、官吏奢侈、荒淫、贪污、暴敛，土地兼并，水利不修，广大农村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又加上连年灾荒，农民在饥寒交迫、流离逃亡的情况下，与统治者的矛盾达到了极尖锐的程度。为了生存，他们揭竿而起，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明末农民大起义，一举推翻了明朝的腐朽统治。然而由于汉奸、投降派们卖国求荣，造成清军长驱直入，满清贵族登上了统治全国的宝座。这一事变使得当时社会的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出现了汉族人民一致起来反抗满族统治的局面。三大思想家面临国破家亡的危机，曾奋不顾身地投入保卫家乡、抵抗侵略的战斗。尽管他们的抗争最终都归于失败，但是他们始终坚持崇高的民族气节，采取与满清朝廷不合作的立场，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著书立说，苦心孤诣地从事文化建树，寄托了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

明朝亡国的惨痛教训，激发了三大思想家空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们苦苦反思明朝亡国的原因和寻找救世之道。当顾亭林读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之后，抑制不

住自己喜得知音的兴奋，在《与黄太冲书》中说：

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

当时，以三大思想家为代表进行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历史性反思”，表面上主要是检讨有明一代治国的得失；但从实质而言，却一直追溯到从先秦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个历史。有学者认为，三大思想家为首的历史反思，是在西方政治思想之光照进中国之前，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范畴内，对中国封建历史所进行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自发的、全面的反省。

在这场反思中，三大思想家一方面研究历代兴亡、社会变化的规律，同情农民的惨痛遭遇，提出了许多救世方案。像王夫之提出了土地公有、废除剥削的主张；黄宗羲指出君王是天下之大害，倡导民主，设立学校、议会，还主张平均使用土地；顾炎武表达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提出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人文准则，提倡实践哲学，这些都是比较进步的主张。另一方面，他们也接受了欧洲自然科学（如天文、数学）的一些知识，充实和丰富了他们的学术思想，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抨击了宋明理学陷于空谈脱离现实的错误，提出了

“经世致用”的主张，不单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明确为了经世济民而研究学问，为了建设理想社会而研究学问。顾亭林讲他著书是用以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三大思想家突出现实问题，致力于实际问题的探讨，正是他们的共同点。

三大思想家在学术上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如王夫之继承了汉代王充和北宋张载的朴素唯物哲学，加以充实光大，成为中国古典唯物论的最高成就。黄宗羲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萌芽思想，比法国卢梭还早一百年。顾亭林在经学、音韵、训诂诸方面都取得了卓著成就，是清代“朴学”的开山祖师。所以有人这样评价他们说：王夫之是近代哲学的建设者，黄宗羲是近代史学的建设者，顾炎武是近代经学的建设者。

第二节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读者都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顾亭林的警世名言，那么，这句脍炙人口的爱国名言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是怎么得来的呢？

顾亭林在总结明朝失败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改革观，提出了“匹夫保天下”的社会历史命题。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他问道：“亡国与

亡天下奚辩？”他认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亡天下。”在他看来，亡国不过“易姓改号”，其祸还小；亡天下，就要“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其祸最烈。那末如何保天下、保国呢？他指出：“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强调了“亡国”与“亡天下”是不同的，亡国是政权的更替，而亡天下则是世风的沦丧。所以，保国只是当权派的事情，而保天下，则是每个老百姓都有责任的，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此亭林一再说：“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瓜分我中华，许多爱国人士号召全国民众起来反对压迫、反对侵略，时代需要产生一个简单有力的口号，号召民众起来共同奋斗。维新派主将梁启超将亭林的这段议论加以浓缩，他在《变法通论·论幼学》和《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文中两次提到：“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之后，又在《痛定罪言》中首次提炼为：“顾亭林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这个提法一经面世，立即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八个字简洁明了地概括了顾亭林原文的意思，很快成为中华民族爱国救亡运动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口号之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所以具有巨大的鼓动力，

在于她蕴含着一种可贵的民族精神。这句话的核心是“有责”，“有责”的反义词是“无责”，即不负责任。人人都知道，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将一事无成；同样一个不负责任的国家，就会灭亡；一个不负责任的民族，就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有责”就应该理解为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己、对社会、对国家、对整个世界要有负责的、积极进取的态度。

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代就十分钦佩顾亭林，他曾经说过：“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的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体现出这位历史伟人在青年时代就立志于“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远大理想和伟大胸襟。

革命老人胡厥文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写下了鼓舞人心的壮烈诗篇《匹夫责》，他用“天下兴亡匹夫责”来激励国人，不怕牺牲，团结抗日。诗中说：

吁嗟乎——

江山锦绣留灰烬，乔松经斧存枯茎。

黄帝子孙累万万，为奴为隶为鼯鼯。

图自存，赖众擎。

卫国家，须长征。

天下兴亡匹夫责，

汝亦匹夫何不事牺牲！

北京学术界有一位耄耋老人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年近百岁仍然笔耕不辍，他最近出版了文集《21世纪的华语

和《华文》》，周老在该书的前言中建议每一个“21世纪人”都应该以下面的四句话作为座右铭，即：“了解过去，开创未来，历史进退，匹夫有责”。这句座右铭在世纪之交的新形势下，既是老学者的人生追求，也是对青年一代的殷切希望。

如今我们重温先贤的名言，不仅有一种亲切感，更有一种使命感。试想亭林在三百多年以前，提出这句至理名言，需要怎样的勇气！其实，每一个时代都赋予了人们不同的历史责任，每一位公民，每一位青年人，都要以关心集体关爱他人为己任，以关心社会发展为己任，以关心国家命运为己任，以关心人类进步为己任。

第三节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曾经把许多俄国文学名著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著名翻译家草婴，提出知识分子的良知，应该是“有心，有脑，有眼睛，有脊梁，有胆”。讲得多好！作为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在三百多年以前，顾亭林就提出了他自己的学术原则和价值趋向，那就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两句话标举了知识分子学术生活的最高准则。

亭林的这一思想是在《与友人论学书》一文中提出来的：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

这个“友人”正是“卓然经师”张尔岐。张尔岐对此提法十分赞成，他说：“《论学书》粹然儒者之言，特拈‘博学’、‘行己’二事为学鹄，真足砭好高无实之病。”

所谓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前者偏重于知识的获取，教人做学问的方法；后者着眼于行为的约束，是教人做人的原则。

这里的“文”，并不是一般理解的狭义的文学、文艺或者文章。“文”的本意是指木头的纹理，引伸为事物的条理、脉络、规律。亭林认为：“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他所讲的“博学于文”，一方面反对明代理学家空谈心性，另一方面，他强调“多学而识”。他认为，人生哲学（心性）、宇宙原理（天道），都存在于客观事物的条理之中。做学问最要紧的是从日常事物之中寻找知识，所以学习的对象愈详愈博就愈好。那么，亭林自己是怎么去实践“博学于文”的呢？

一是手不释卷。亭林生性好读书，这是他嗣祖、嗣母从小培养的结果。潘耒说他：“先生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据亭林自己回忆，十一岁便开始读《资治通鉴》。他纂辑《天下郡国利病书》，从崇祯己卯起，凡阅书一千余部，当时他只有二十七、八岁。到六、

七十岁的时候，潘耒请求他出版《日知录》，他却说：“以临终绝笔作为定稿。”深知学无止境不肯轻易发表出来。他主张：“君子之学，死而后已！”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平时在旷野上长途旅行，他就在马背上默默背诵经文和注解，碰到一时想不起来的句子，就到旅店拿出书来反复诵读，直到完全记住才肯罢休。好友王山史曾经回忆亭林，“每见予辈或宴饮终日，辄为攒眉，客退，必戒曰：可惜一日虚度矣。其勤厉如此。”

二是博览群书。不管是历史的、经济的、农业的、水利的、军事的，各种各样的书籍、典章，亭林都读都看。他在北游以前，已经读书一万二千余卷；十年以后，在北方“所览书又得万余卷”；后来读的书更多，粗粗一算，亭林一生读的书应该不下三万卷。他所到之处，随时遇有好书，就收购下来，以供研究；如果人家收藏的善本，不愿意出售，就自己动手抄录，或募人代抄，抄写之书，也有两大箱。他又欢喜金石文字，凡是游历名山、巨镇、祠庙、寺院等地方，总要探寻古碑遗碣，拂拭研读，并手自抄录。有时发现一篇前人从未发现过的文章，高兴得睡不着觉。他在旅途中搜集的汉、唐碑版的拓本也很多。

三是实地调查。亭林不是死读书，而是注意联系实际。潘耒说：“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如指诸掌。”怎么会每个地方都了如指掌的呢？因为他每次出门旅行，都用两匹马、两匹骡跟着，

两匹马换着骑，两匹骡子驮着几筐书籍，凡到险要的关隘、要塞，便找老兵退卒，问长问短，如果发现与平时所听说的不一致，就寻个茶馆翻书查对。可见他的知识，不仅仅是依靠书本而来。后来清代的考据学家只是从书本上讨生活，不注重亲身实践，所以那些皓首穷经的学者肚子里学问再多也及不上顾亭林。

在做人方面，亭林提出了文化人的行为准则是“行己有耻”。因为宋明以来的学者，动辄教人以明心见性，超凡入圣；许多人滥唱高调，空谈欺世，“致知格物”不过是一句口头禅罢了。一些读书人钻营利禄，胁肩谄笑，献媚当道。在这种风气下，读书人寡廉鲜耻，丧失了人格，当满清人主中原，立即卖身投靠，一副卑鄙无耻的嘴脸。

怎样才能保持一个人的人格尊严？亭林认为最忌的是圆滑，最要的是方严。他说：“读屈子《离骚》之篇，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也。同乎流俗，合乎淤世，则不可心入尧舜之道矣。”亭林小住京城时候，外甥徐乾学想请亭林夜饮，亭林怒斥道：“古人饮酒卜昼不卜夜，世间唯淫奔纳贿二者皆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从这件小事情上便可以看出亭林为人方正耿直。

顾亭林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一个人穷不可耻，可耻的是不能为老百姓谋利益。但是在北方游历途中他看到百姓流离失所，正是地主、官僚对老百姓剥削压迫的结果。他在《双雁》诗中揭露道：

有客从南来，遗我一书札。
上写召旻诗，如彼泉池竭。
下列周鼎文，食人象饕餮。
书成重密缄，一字一泣血。
传之与贵人，相视莫敢发。
所计一身肥，岂望天下活！

《召旻》是《诗经》中的一首讥讽周幽王鱼肉百姓的诗，诗中提到的“饕餮”，是古代铸在青铜器上的一种图腾，古人以“贪财为饕，贪吃为餮”，亭林自注：“《吕氏春秋》：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在他眼中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吏是“饕餮鬼”，是“硕鼠徒”，所以亭林把客人寄来的信札给他们看，这些人都不敢打开来看。诗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为了“一身肥”，而不顾老百姓死活，刻画出统治者无耻的嘴脸。所以“行己有耻”，就是要严格律己，而对于老百姓要关爱，为他们谋利益。

第四节 经世之学，当世之务

人们常用“亭林经济”四字来概括顾亭林一生的成就，这里讲的“经济”，不同于现代的“经济”概念，而是“经世济民”的意思。前面讲过“经世致用”，是顾亭林研究学问和写作的目的，是一种实践哲学的观点。他不是为学

术而学术，而是把国家天下的事都当学问去切实地研究，这与儒家所提倡的“入世”思想是一致的。他这样说：

窃以为圣人之道，下学上达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三礼、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著之书，皆以为拨乱反正、移风易俗，而无益者不谈……其于世儒尽性至命之说，必归之有物有则，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空虚之论。

可见他所从事的研究课题都不离开社会实践，他的著作是用来“拨乱反正、移风易俗”的，符合经世济民的要求。为此他申明：“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并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他认为研究学问的目的在于“明道”，在于“救世”，附庸风雅、玩物丧志的东西都不值得去做。黄汝成说他“负经世之成，著资治之书”，正确地指出了亭林做学问和写作的目的。可是到后来因为满清的政治压迫，考据学走入了死胡同，亭林所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失去了传人。他的实践哲学和务实精神，一直到晚清才渐渐复活起来。

顾亭林“经世致用”思想的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

第一，政治思想。顾亭林对于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有他自己独到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见解。比如他著作《日

知录》的目的就是想等待“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

虽然亭林没有像黄宗羲那样激烈地反对封建君主独裁制度，但他自己承认他的主张和《明夷待访录》相合之处有十之六、七。可见他的政治见解，基本上和黄宗羲互相呼应、互相启发。他认为：

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益尊。

他认为贵为帝王“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劳；宅天下之至贵者，必执天下之至贱。”指出帝王应该操劳，不能高高在上，不能养尊处优。如果这个帝王“非绝世之贤”，就不能“肆于民上以自尊”，当然也就不能“厚取于民以自奉”。体现了他的民主启蒙思想。

他大体上和黄宗羲的论方镇相似，提出了类似于中央与地方分权而治的民主政治理论。《郡县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大胆地推论由封建变为郡县，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他根据过去封建制度不得不变，而推定郡县制度也不得不改变，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看法。然而实际情况是：“言莅事而事权不在于郡县，言兴利而利权不在于郡县，言治兵而兵权不在于郡县，尚何以复论其富国裕民之道哉？”所以亭林主张把“辟官、莅政、理

财、治军”四方面的权限，一起归于郡县，这样才可以实现“国可富，民可裕，而兵农各得其业矣。”还具体规划了县令的推举、提拔、任用的程序。他的这种重视地方基层政权建设的思想，虽然是一种空想，但反映了他否认封建专制集权的政治观点。

亭林反对明朝科举制度，认为它和“焚书坑儒”一样弊多利少。明代以八股文取士，使一般读书人把精力耗费在“八股文”上，除了钦定的《性理大全》和朱熹《四书集注》外，其他书籍几乎一概不看，其他事物一无所知。对此，亭林在《生员论》中明确指出了中国封建科举制度的很多毛病：比如考试的程序太繁，特异之才无由拔出。考试的范围太狭，浅学无识的人只要稍一预备也可以侥幸中试。程文的格式太呆板，既违反作文的原则，又养成抄袭剽说的习惯。取士太滥，而任用又太快，结果生员遍天下，害民乱政。他进而提出了一些改良办法：一是取消岁贡与举人，使“天下之人皆得举而荐之”；二是生员名额从减，挑选从严，取中以后，所授不过簿、尉等亲民之职，使读书人消除侥幸速成心理；三是试题范围须扩大，使之以一经而通于五经；四是取消八股程式，令读书人自由创作，那么俊异之才就可以涌现出来。总之，国家要以实学为教学内容，读书人则以实学为学习课程。国家取士力求严格，而士子亦必束身自爱，则真材实学自然养成。亭林的这种设想，与黄宗羲的观点大同而小异，只是黄氏偏重

在学校方面，而他偏重在科举方面，但都反映了当时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级要求参政的呼声。

亭林还极力反对封建特权，他曾严厉地揭发封建统治的下层势力如何残害百姓，他说：“天下之病民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他认为其中以生员的危害最大。他列举了生员制度的各种罪状，一是造成了人才败坏。亭林统计过，如果每个县以三百个生员计算，全国就不下五十万人，这些候补官僚只知道学八股文以猎取功名，构成了“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的特殊社会阶层；二是增加人民负担。按例生员可以免除赋役，“于是杂泛之差，乃尽归于小民，小县有至生员千人以上者比比也。”这些负担都转嫁到农民头上，所以“生员之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然而一切考试科举之费，犹皆派取之民，故病民之尤甚者生员也”；三是聚众滋事。生员实际上已经成为地方势力的斗争工具，亭林揭发并批判道：“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官吏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吏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因此，他大声疾呼要废除生员制度。

第二，经济思想。顾亭林经济领域的建树也是多方面的，在他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中，经常围绕社会经济稳定的问题提出管理经济生活的方略和看法，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涉及所有制、农业、手工业等

各方面。

首先，承认“私”利。亭林曾经提出：“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是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明确指出“私”是人之常情，没有必要违反这种常理，国家应该尊重和保障人民的私利，让人民先安其居乐其业，那么家富了就是国富了，这才是天下大“公”。这与黄宗羲“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的思想是一致的，也与近代财产私有、私人财产神圣的思想是有着共通之处。不能不承认，在三百多年以前，亭林就敢于挑战“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传统观念，承认人类“自私自为”的合理性，倡导个人的解放，这是多么宝贵的思想！由此，亭林也主张土地私有。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中，有官田与民田两种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形式，而官田变为民田是一种历史趋势，但是明代王室、公卿以“官田”的名义大量兼并农民土地，使官田数量大幅上升。这样就造成了“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导致“人奴之多，吴中为甚”，不正常租佃关系，实际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他赞成北魏时期的均田制，并主张废除官田，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产权转移。

其二，重农思想。亭林认为：“天下之大富有二，上曰耕，次曰牧。国亦然。”可见他的经济思想基本上与西

方的重农主义相近似。表现在：一是重视水利建设。他认为兴修水利是根本大计，当他看到“淞江日就枯涸，惟独昆山之东、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岁苦旱灾。”看到黄河决堤，而“司水之臣，又乘其决者以为利”，感到非常痛心，就说：“愿作劝农官，巡行比陈靖。畎浍遍中原，粒食治百姓。”常熟县官耿橘兴修水利，使“百室满仓箱，子女时昏聘”，亭林则十分赞扬，《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就采纳了耿橘《水利全书》的许多内容。二是主张开垦荒地。亭林认为一个称职的地方官，第一件事情就是“土地辟、田野治”，他主张要“地辟耕广”，以增加农业产量，使“谷贱”以养活百姓，实现“人聚于乡而治”的目的，从根本上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他自己也曾经亲自参加过山西、陕西等西部地区的垦荒开发事业，为后人作出了榜样。三是鼓励边民纺织。亭林看到“边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织”，认为对西部地区的生产发展十分不利，所以他以延安府为例，主张由官府来发动，授机于民，募能织者为师，教之以纺织之术，这样，百姓不仅可以获纺织之利，还可以节约开支改善生活。这一设想直到八年抗战最艰难的时候，毛泽东号召边区人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才真正得以实现。

其三，反对重赋。关于田赋问题的讨论集中体现在亭林的经济论文《钱粮论》里，他抨击了当时的田赋制度，竭力反对以钱代粮的做法，他认为“银非从天降”，如果

断绝流通，禁止采矿和海外贸易，再逼也生不出来。所以没有必要强求全国一律采用征银，应该“度土地之宜，权岁入之数，酌转般之法”，采取灵活的办法征赋，在偏远地区，继续实行实物田赋制度。他还坚决反对“财聚于上”的超经济剥削，反对地方苛捐杂税，认为过分剥削农民，会使农民因无法生存而逃亡，应该减轻对农民的税额。他关于“苏、淞二府田赋之重”的记录，历来被中外经济学界引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经典案例。

第三，社会理想。亭林曾经大胆描绘过这样一幅中国农村风调雨顺、太平盛世的美丽图景：

岂知太平之世饴甘荼，川流不盈泽得渚。风雨时顺通
祈雩，春祭三江，秋祭五湖。衣冠济济郊坛趋，岁输百万
供神都。江头担酒肴，江上吹笙竽。吏无敲朴民无逋！

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亭林深刻地指出：“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矣。百年毕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风俗”就是民风世俗，指整个社会的风气，一方面，亭林深知“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主张“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产，使之甘其食，养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另一方面，亭林认为风俗是可以变化的，他从历史上人心风俗的变化历程分析，认为即使“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但是如若“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

着重强调了“清议”，即社会舆论对于风俗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亭林所谓的“清议”与魏晋时期“竹林七贤”推崇的老庄“清谈”之风不同，“清议”是以天下国家百姓的生活为讨论对象，相当于现在所说的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这和黄宗羲的“学校论”大体上是相同的。他援引陆游《岁暮感怀》中的诗句：“人材兼南北，议论忘彼此”，寄托了他对言论自由的向往。

第五节 采铜于山，著作宏富

纪晓岚在《四库全书目录提要》中说：“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为什么能做到这样？这与亭林严谨治学的方法有关。侯外庐在《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中指出顾炎武治学的特点，在于“有判断以后‘验于事物’的方法论。”他认为亭林的治学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他研究古籍，并不是钻研载道之文，而是考证古制，‘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第二，他研究经术思想，亦在发现古今思想之异同离合，而否定了‘心不待传’的道统。第三，他虽然言法古用夏，但重在‘引古筹今’。第四，炎武虽然说遵循‘六经之所指’，但对于诸子百家之学，并不认为异端。”

那么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侯外庐进一步说：“第一，重调查——他不独要在书本上搜集证据，并且还注重实地调查，以期能获得一事物的真实面目。第二，重直接资料——他平生最恨窃书贼，把古人的制成品，加一点减一点便成了创造。第三，重广求证据——凡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第四重辨源流、审名实——他倡导明辨历史的流变，考究古今的异同离合。第五，重明古今史学——他不但重在‘六经之所指’，而且重在古今历史之递变。第六，重存疑，不盲从——他的研究考证宁肯缺疑，不作主观的臆度。第七，重虚怀广师——他虚怀若谷，敢于自我否定。第八，重手脑并用——他不专门靠书本，而重在实践中检证，和王夫之所谓先‘甘苦自尝’是相似的。”

事实上，亭林做学问的具体方法，跟从小受到祖父蠡源公教诲“著书不如抄书”有关，他一生的学问都从抄书入手，可以这样说，亭林是从抄书开始来达到著书的目的。像《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属于抄书摘录汇编性质的作品。就是《日知录》，亭林平生最得意之作，也“引据浩繁”，亭林自己所下的论断，只占全书的十分之二、三，大部分都是摘录、引用、排比前人的论述。

或许有人就会说：这也算做学问吗？抄书谁不会呢？其实不然！当时，有位关心亭林著书的朋友，问及《日知录》写作的进度，亭林回答说：“我曾经说过，现在人写

书正如现在人铸钱一样，古代人从山里采来铜矿通过冶炼铸造钱币，现在人却买来旧钱，称为‘废铜’，打碎后熔化了再铸，不但粗制滥造，更可惜的是把古人传下来的珍品给毁了。我一年来，从早到晚读书，反复研究，只不过弄清了十来个问题，这算得上是直接从山中开采铜矿了吧。”亭林就是用“笨工夫”——采铜于山，把许多资料汇总、对比、校勘、提炼，然后纂辑起来。这决不是件容易的事，亭林自己说，一年时间只能做十几条。潘耒说：《日知录》是“随时札记，久而次成”的。

在清代，有人拿亭林的《日知录》与黄东发的《黄氏日抄》、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作比较。从三本书的体例来看，好象差别不大，但是从其内容分析，就能区别出不同了。《黄氏日抄》、《困学纪闻》大多是单词片义的随手札记。《日知录》则不一样，每一条都整合数条甚至数十条相关内容的“卡片”，再在这个基础上拎出中心思想，这个工作就是治学所必须做的“长编”，没有这番工夫，研究工作决不能完成。而且《日知录》全书结构性很强，许多条目精心排编，前后照应，互为因果，阐明同一个道理，一条都不能少不能缺，可见其治学的良苦用心。对此，梁启超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黄氏日抄》、《困学纪闻》这种随手札记，好象是原料或毛坯，最多可以比方绵纱或纺线；而亭林精心打造的《日知录》，好似一件精心加工的制成品，是“篝灯底下纤纤女手亲织出来的布”。两

相比较，不可同日而语。后来清代考据家大多人都取法亭林。

亭林的著述，有人统计共有六十二种，五百二十八卷。若论专精，可能比不上后人；如果从学术方面之多、规模气象之大来说，那么清代乾嘉学派的学者没有一个能出其右。以下列举亭林的几部代表作：

《日知录》三十二卷。是他生平最得意的著作，他说：“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又说：“意在拨乱涤淤，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读这些话，可以了解亭林著书宗旨，亭林的学问心得，都在这书中见其梗概。此书约始撰于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即亭林离开科场之后，直到临终方告绝笔，历时四十余载。

《日知录》是一部读书札记性质的学术巨著，内容丰富，规模庞大。《四库总目提要》叙列这部书的内容：“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十七卷论科举，十八至二十一卷论艺文，二十二至二十四卷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杂考证。”共计一千零十三条，所涉及的领域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

军事等社会的方方面面。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讲：“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輿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至于叹礼教之衰迟，风俗之颓败，则古称先，规切时弊，尤为深切著明。”后人称之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而书中涉及的每一个学术门类，都给后人开辟了研究领域。

《音学五书》三十八卷。《音学五书》是亭林代表作中最富原创性的作品。他自己对于这部书很满意，说“某自五十以后，于音学深有所得，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这是一部关于我国古代声韵学的重要专著。古声韵学，作为我国古代汉语中一门比较狭窄而且非常枯燥的基础学科，历来少有问津者。南宋时，有过《韵补》、《古音辨》两本韵书，但是当时的人并不知道古韵本身有自己的规律。明代中叶，陈第作《毛诗古音考》才认识到“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道理，虽作了些比较，但仍散漫而不成系统。到了亭林，他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他对于音韵学的深入研究远远超过了前人，方法也比较科学，形成了系统的学术门类。他审核了《诗经》中的一千九百余个韵字，与《广韵》韵部比勘，分别同异，综合贯穿，定古韵为十部，开辟了清代研究《诗经》古韵的先河。

《音学五书》由五部组织而成：一为《古音表》三卷，二为《易音》三卷，三为《诗本音》十卷，四为《唐韵正》

二十卷，五为《音论》三卷。在全书中《唐韵正》卷数最多，他说学者读其书“必先《唐韵正》，而次及《诗》、《易》二书”。他认为《广韵》的二百六韵的分部就是根据《唐韵》，这本书就是为订正《广韵》的读音而作，所以叫《唐韵正》。书中罗聚材料之丰富，让人惊叹，除《诗经》、《楚辞》和先秦经传诸子之外，下到两汉以及南北朝的诗赋、史传、碑刻，都拿来参证。这种大规模研究；对清代文字音韵学影响很大，清代许多学者钻研音韵学，而且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绩，是由亭林首先开创的。

《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两部书都是亭林青年时期就开始着手编纂的作品。自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二十七岁开始，到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完成草稿。前后二十年多。虽然这两部书都不是成书，但两书结构宏大，内容详实，材料丰富。不但后来治经济地理学的学者受惠，而且为人文学科研究提供了材料的渊薮。

此外亭林的著述，尚有《金石文字记》六卷、《五经同异》三卷、《左传杜解补正》三卷、《九经误字》一卷、《五经考》一卷、《求古录》一卷、《韵补正》一卷、《二十一史年表》十卷、《历代宅京记》二十卷、《十九陵图志》六卷、《万岁山考》一卷、《昌平山水记》二卷、《岱岳记》八卷、《北平古今记》十卷、《建康古今记》十卷、《营平二州史事》六卷、《官田始末考》一卷、《京东考古录》一卷、《山东考古录》一卷、《顾氏谱系考》一卷、《谪觚》一

卷、《菴录》十五卷、《救文格论》、《诗律蒙古》、《下学指南》各一卷，《当务书》六卷、《菴中随笔》三卷等。

《亭林诗文集》是顾亭林诗歌、文章合集，他一生共创作诗歌426首，单篇文章、书信270篇。读他的诗文有助于全面了解亭林的人生轨迹和生平志向、心情性格。亭林诗文是清初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该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读本。

第六节 开三百年学术风气

亭林认为明末社会的腐朽，表现在政治上，也表现在学风、文风上，当时的社会思潮空虚、浮华，造成一般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而又皆躁竞之徒，欲速成以名于世。”亭林结合实地考察，提出了明道和救世两个方面，主张“经世致用”之学。对于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农林、水利等进行调查研究，指明了学术途径，开创了清代二百多年的学术风气。梁启超认为顾亭林在清代学术界有着特别的地位，一是开了有清一代的学风，二是开了治学的方法，三是开了一批学术的门类。

顾亭林著作宏富，涉及面广，这里举出他在经学、哲学、史学、文学四方面的成就以及影响：

经学方面。有清一代的学术以经学为中坚，“经”是

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结集，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经”是其源，而“史”则是其流。顾亭林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提出了“理学，经学也”的命题，将宋明理学扭转 to 崇尚直接研读先秦儒家经典上来。这一命题提出，开启了清代主流研究，亭林因此而成为清代朴学的开山祖师。

关于这个命题他是这样说的：“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他强调读通读懂儒家经典是研究经学的前提。亭林指出要研究经文，必须首先懂得字义，要懂得字义，必须明白古人的音读，所以他特别重视经学研究的重要工具——音韵学。

从学术上讲，音韵学属于“小学”（语言学）范畴。亭林研究的目的，是要解决经学中的问题。他的《音学五书》在音韵学上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该书发现了中国的语音曾经两度大变化，进而分析古韵的部类，探讨了“古人四声一贯”论古韵通转、论入声分配等诸多长期困扰经学家的问題。诚如王山史《山志》中说：“博稽详研，发前人所未发，为不朽之业者，顾亭林之于音韵、梅九鼎之于历数、顾景范之于地理也。”夏炘《古韵表集说》云：“顾氏博考群编，厘正唐韵，撰音学五书，遂为音韵者之大宗。”后世学者说：“古音之学，不始炎武，亦非至炎武而达于邃密，然而清代三百年间，音韵学之规模，实由炎武创之。”近代大学者王国维说：“古韵之学，自昆山顾氏，作者不

过七人，然古音廿二部之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故训故名物文字之学有待于将来者甚多，至古韵之学，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评价十分高。

除了音韵学之外，顾亭林对于《易》、《诗》、《书》、《三礼》、《春秋》、《论语》、《孟子》，都有专精的著述。前面提到过汪琬说：“其经学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顾子宁人、李子天生。”亭林对《易经》有精确的理解，觉得“尽天下之书皆可注易，而尽天下注易之书不能以尽易。”他反对用神秘的眼光看《周易》，把它当做星相占卜的书，推崇朱熹的《周易本义》。他对于《书经》抱怀疑的态度和辨伪的精神，通过探讨了《书经》的源流，疑其所当疑，信其所当信。对于《诗经》亭林用功很深，他曾把《诗经》所用的音互相参考，证以其他书籍，作《诗本音》；他认为孔子删诗，只是做了“选其辞，比其音，去其烦且滥者”的工作，他对于《诗经》的年代问题、次序问题、用韵问题也做过讨论。他特别重视《仪礼》，注重节文，不尚空谈。他对《春秋》三传，重论是非，绝无门户之见，对三传都有所批评，而他解《春秋》则间采三家之说，间亦自抒所见，持论甚平。对于《论语》与《孟子》，他认为孔学乃“修己治人之实学”，非“明心见性之空言”。总之，亭林对儒家经典的研究评论，大都平允可行，一些历史的翳障，经他一番论证，次第扫除。

哲学方面。亭林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哲学家，但是

他的哲学思想大致是以朴素的、客观的、实践的唯物观，来反对明末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的主要哲学观点大多见于《日知录》中。第一，主张物质第一的唯物观。他十分推崇张载的气论学说，并提出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宇宙论的命题：“盈天地之间者，气也。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认为充满天地之间的只有气，一切存在都是气的聚散形式，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阐发了物质第一性的观点，他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第二，反对迷信神秘的鬼神观。一方面，他从儒家传统思想出发，肯定祭祀活动是必要的，能够培养人们生孝死祭的礼仪规范，可以起到社会稳定的功效。另一方面，他又从“气”的变化角度分析了鬼神问题，说：“鬼者，归也”，即万物散开，复归于无形的气的变化。由此他批判了佛道两家宣扬的善恶报应说，还批判了所谓的“长生不老”和“生死轮回”之说，并且对“招魂之葬”等许多世俗的迷信活动持否定态度。第三，提出“与时偕行”的进化论。他说：“日往月来，月往日来，一日之昼夜也。寒往暑来，暑往寒来，一岁之昼夜也。小往大来，大往小来，一世之昼夜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则终日乾乾，与时偕行。”通过剖析自然界的變化现象，强调人的行动应当和自然界相适应，提出了“与时偕行”的进化观，其进步意义不言而喻。第四，主张“验

于事物”的认识论。针对明末主观唯心论“用心于内”的观点，他提出了“理具于吾心而验于事物”的观点，强调辨别是非，必然要诉诸于客观存在的事物，决不能离开所见所闻的经验，要以客观事物经验来检验人的认识正确与否。由此，他进一步揭示了人的思维，即“心”，对人的感官的依赖关系，同时也充分肯定“心”的思维作用，比较全面地阐明了认识事物的规律性。

史学方面。一般人认为就史学而言，亭林不及黄宗羲精深，不如王夫之见解卓越。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和“史”是不分家的，事实上亭林的确有历史的癖好，他自称：“太息天下乏材，以致败坏。自崇祯己卯，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他治史不但长于考古，而且熟谙当世之务。他编辑《明季实录》和《皇明修文备史》，就是预备纂修明史，只是因为他将有关的明史资料借给潘怪章遭受损失，才无法进行。他生平巨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与《肇域志》，就是他探讨历史地理学的重大收获。由于他对史学有深刻的研究，他的《日知录》对历史名著，像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前汉书》，荀况的《汉纪》，范曄的《后汉书》，李延寿的《南北史》等，都作过评论。亭林认为编纂史书，固然要有正确的目的，同时还要有丰富的史料，细密的考证。主张汇罗宜博，裁断宜精，还得顾到史实明晰。他治史学讲究实事求是，很有辨伪的精神。他又认为历史记载的事有一些是靠不住的，而要证明古事

的真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非有真凭实据不行，足见他治史“考而后信”的精神。此外他对于金石学、地方志也作了大量的研究。

文学方面。亭林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散文方面。一是主张文学应负担起“救民以言”的责任。他不满意明代末年那种抒写闲情逸致或“注虫鱼，疏草木”一类的诗文，他反对次韵、唱和，主张文章篇篇要有实用，对无聊的应酬文章深恶痛绝。他的《亭林诗文集》就继承了中国古代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贯彻了“经世致用”的原则，体现出对社会、对人生的关注，其题材是现实的，思想是严肃的。他赞成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诗文多是时代的反映，具有深厚现实意义。后人评说：“先生身负沉痛，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奔走流离，抚时感事诸作，实为一代诗史，踵美少陵。”认为他的诗和杜甫“诗史”一脉相承。二是主张文学随时代的变迁而发展的观点。他认为：“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所以他反对文章拟古，反对剽窃古人的作品，反对运用一味使用生僻典故。三是主张以真为文为诗。亭林主张诗歌“言志”、“主性情”而“不贵奇巧”。他的诗不是言之无物的诗，诗中没有一句是空虚之语。他注重诗的内容，不重诗的形式，他觉得诗不应该受韵律的过分拘束，所以他认为诗可以有无韵的句子，

因为诗是性情的自然流露，不能勉强。他主张“诗不必人人皆作”，况且每个人对于诗的兴趣和涵养也各不相同。他认为因题而写诗，是为文而造情，其情便不真；因诗而定题，是为情而造文，这样的情，自是真情。以真为文为诗，这样的诗文，自然是天地间的至文，否则不过是“文冢”而已。所以他的散文不事藻饰，表现出纯朴自然之美。最后，他还强调“文须有益于天下”，他认为“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反之，则“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由于亭林所处时代的政治压力，他在诗中不得已运用了许多典故，比较费解，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可读性。大致说来，亭林的诗歌古体比近体多，五古比七古多。这是因为近体诗格律严局限性大，不容易表达深刻的思想感情，而古体则自由多了。所以，朱彝尊论亭林诗：“诗无长语，事必精当，词必古雅。”《明诗别裁》更说他的诗：“词必已出，事必精当。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就诗品论，亦不肯作第二流人。”评价很高。

第五章 万世敬仰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每每读亭林的诗文，他的高大形象便跃然纸上，心中就会默念起臧克家有名的诗句。

第一节 亭林墓地

顾亭林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正月初九，殁于山西曲沃韩氏宜园，山西的生前好友们帮助亭林嗣子顾衍生料理了后事。等到三月，亭林的族弟顾岩从昆山赶来，才和顾衍生一同扶柩回到家乡千灯镇。

先生墓地，在千灯镇顾氏南宅故居的后面，蒋泾之西

南，位于其曾祖明兵部侍郎顾章志赐莹之东，葬于嗣父顾同吉、嗣母王贞孝墓穴次位。墓高约1.70米，东西直径约9米，南北直径约7米。先生门人潘耒为先生墓作了墓表，黄宗羲的学生全祖望作神道表。归葬时，随葬的还有先生坐骑尸骨一具，是先生遗命归葬的，因此在先生北宅故居的后园有一座马坟。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三月，新阳（今昆山）知县万立钧重修了亭林墓。墓碑上刻有“顾先生亭林暨配王硕人合墓”，墓用青砖围砌，墓正南面立有一座石牌坊，为两柱出头无楼式，正方形花岗岩石柱。坊额正面书“贞孝”两个大字，右柱刻“明故昆山文学顾同吉聘妻，大儒顾炎武嗣母王硕人，未婚守节，崇祯十年旌表，事详《明史》”等字。坊额背面书“忠孝醇儒”四字，左柱刻“清处士亭林顾先生，年六十九，自华阴归葬，行详《国史儒林传》”等。右柱刻“光绪二十年甲午三月，署新阳县令南昌万立钧书”。墓门左右的围墙上嵌有青石碑各一块，两块石碑上所刻的行楷书均系万立钧手书，左碑诗一首：

云气郁千墩，灵风啸墓门。经纶儒者冠，道德布衣尊。

莹尚先朝赐，碑无片石存。封题愧仓卒，再拜荐荃荪。

右碑为告示：

呜呼！是为大儒顾先生亭林之墓。过者必敬，樵牧者无侵。封树培修，守土官与乡人士之责也。勒兹片石，敢告后人。南昌万立钧写记。

墓后有柿子树四棵，是原有之物，亭林曾作《寄题贞孝墓后四柿》诗。墓道左右栽有松柏数十株，苍翠挺拔，象征着先生坚贞不屈的精神。

民国初年，昆山乡绅方还倡议社会各界捐资，对先生墓进行了部分修葺。

1956年亭林墓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江苏省文物管理处派专人对亭林墓进行修理。为纪念顾亭林诞生三百五十周年，1963年再次重修，并补种了四棵柿子树。1984年，江苏省文化厅、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昆山市政府等单位拨款重修顾亭林墓，恢复为省文物保护单位。

亭林归葬故里后，慕名前来祭扫墓茔的络绎不绝。尤其是到每年的正月初九，即亭林逝世的忌日，顾氏家族小辈、各地名人学士、后进青年及地方人士，纷纷聚集千灯，祭扫英灵。只是为避满清耳目，其中有的人就打扮成商人或做小买卖的作为掩护，一面悼念先生，一面结交同志。久而久之，每年的这一天，江南江北的走脚贩夫、民间艺人也都不约而同来到千灯赶会，就连周边数十里外的村民也会来赶集，因此古镇上常常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千灯镇正月初九赶大集的习俗，直到上世纪中叶仍然常盛不衰。

亭林先生不仅为国内人士所崇敬，亦为外国学者所敬仰。1917年美国哈佛大学一教授，曾专程来千灯瞻仰亭林墓，观看其遗履，并献以鲜花一束，供在先生神位之前。

抗日战争前，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清水泰次，亲自捧着香烛、果品上祭，行三鞠躬礼，还瞻仰了先生遗像、遗履，并与先生十三世孙合影留念。

每逢清明节，昆山及千灯镇的领导干部、各界代表、顾氏后裔总要在先生墓前献了花圈，举了扫墓礼。

第二节 顾亭林祠堂

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十二月，江苏巡抚会同江苏学政上疏朝廷批准顾亭林入祀乡贤祠。当月，礼部奉旨，准许先生入祀昆山乡贤祠。此后各地开展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北京大报国寺顾亭林祠堂 在原大报国慈仁寺内西侧。据载，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亭林曾经寄寓此寺。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夏，何绍基倡议集资为先生建祠堂。由何绍基、张穆经手负责建祠，共建屋三楹，祠额为曾国藩题写。第二年初落成，二月十四日正式公祭。从此以后一年三祭成为京城中名公巨卿、鸿生硕儒以及四方生员包括孔氏后代的重要活动。据原始记录，从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初祭，到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秋祭为止，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前后共三十年，会祭达87次之多。参与亭林祠会祭事的不乏清代达官

显要、文坛名流和各地举子，其中有户部尚书常熟人翁同龢、军机大臣苏州人潘祖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湖南巡抚苏州人吴大澂，还有《海国图志》作者魏源、资产阶级改良派先驱苏州人冯桂芬等，以户部尚书罗惇衍参与祭事最多。此外朝鲜使臣朴圭寿曾两次参加祭礼。公元1862年，朝鲜国礼部侍郎朴圭寿奉使北京，雅慕亭林之学，特谒祠致祭；11年后，载淳（同治）大婚，朝鲜又派朴圭寿入京进贺，临行前，他再次到亭林祠致祭。朴圭寿两祭亭林祠，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传为佳话。

玉山书院顾亭林祠堂 在昆山市玉山镇北后街培本小学校址。道光末年，昆山县在城内玉山书院（现培本小学校址）东偏设一祠堂，专祀顾亭林先生。该祠为三开间大殿，系砖木结构建筑，方木椽子圆石墩。祠内原有亭林的木主及塑像，殿上匾额书：“一代儒宗通天地人”。柱上有朱彝尊所作对联，左联为“入则孝，出则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后学”；右联为“诵其诗，读其书，友天下之士，尚论古人”。这里每年的祭祀活动，一直到1936年亭林祠搬迁到亭林公园为止。

北京十里庄顾亭林祠 清末，列强瓜分中国，时局动荡，大报国寺内的顾亭林祠会逐渐废止。光绪年间，苏州人顾肇新、董理等倡导移祀至十里庄苏太丙园。该园正屋祀范仲淹，西庑祀顾亭林，参加祭祀的人基本上局限于苏州人范围之内。祭祀活动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

千灯镇顾亭林祠堂 在昆山市千灯镇顾亭林墓前60米处。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广东学者梁鼎芬专程来千灯镇瞻仰亭林墓及其遗履遗像。之后，由其出资委托先生十二世孙顾子玉筹建亭林祠。该祠由上海青浦县朱家角镇的营造厂名匠王世昌设计建造。祠南向，三间两走廊一门楼，以三间连通为一大间作为祭堂，正中设神龛一座，供顾氏历代祖先、亭林先生与王硕人神位，龛前放置一张供桌，两旁设茶几椅子两套。左右柱上悬有木刻板对一副，两边墙上以及外面两走廊墙中共嵌有砖石刻碑十二块，记述先生事略。庭中有盘槐、桂花各两棵，门楼正面有篆体字“顾亭林先生祠”及建造年月。门楼下有木雕花板，一色红漆，两扇黑漆大门，黄铜门环。庄严肃穆，令人肃然起敬。祠前十几丈，建有一座亭子，彩色葫芦结顶，亭的四角装有泥塑彩凤，双翼展开作飞翔状。亭内三面设座位，座位是雕花栏杆的“美人靠”，亭中悬挂匾额曰“四柿亭”，取意亭林在曲沃所写《四柿》诗意。亭子的两旁有桃树六棵、垂柳四棵。每当春暖花开时，游人三三两两走向亭林墓园，或散坐在草地上，或靠坐在亭子里，谈论着亭林的遗闻逸事。亭林祠堂在十年浩劫中被破坏，上世纪八十年代恢复。

亭林公园顾亭林祠堂 位于亭林公园内马鞍山东麓，原刘过祠堂，亦称“东斋”。1936年，由昆山著名的乡绅方还等倡议，从原玉山书院迁至亭林公园内。东斋是纪念

南宋著名爱国词人刘过而建，刘过，字改之，江西太和人。他在昆山病逝后就葬在马鞍山东麓，现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祠堂为五开间，正厅东西设偏室。祠前左右各有一座小亭，亭内置巨型昆石两块，左为“春云出岫”，右为“秋水横波”，是历史名石镇祠之宝。祠正南有一水池，池中种植的是元末名种、荷花极品——并蒂莲。

曲沃朱子祠 遗址在今山西曲沃一中校园东北部。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四月，曲沃人士在当地朱子祠内悬亭林画像，立先生牌位，行四时祭礼。

曲沃孔庙 即今曲沃县政府招待所。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曲沃人士将亭林的牌位陈列于该县孔庙之中，行四时祭祀之礼。

第三节 顾炎武纪念馆

公元1998年10月5日，正值中秋佳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来到了亭林公园，他在高大的顾亭林石像前驻足瞻仰，石像后面的照壁上刻着顾亭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系李一氓先生手书，八个大字在阳光的照耀下分外夺目。江泽民同志颌首将八个字读了一遍后，对身边的同志说：“顾炎武是个了不起的思想家，他在各方面都很有学问，他还研究农业、水利，

也懂音韵学。”随后，江泽民同志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顾炎武纪念馆，并欣然签名留念。

顾炎武纪念馆倚山而立，占地5亩，建筑面积共2000平方米，1988年由昆山市政府决定在亭林公园内修建，1990年5月1日落成并对外开放。该馆先后被命名为苏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江苏省学校德育基地等。

纪念馆正门上方悬挂一匾，为何绍基手书汉隶“亭林先生”四字。纪念馆正厅为享堂式，门口挂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厥文手书“顾炎武纪念馆”的匾额。正厅上方悬挂著名书法家沙孟海行草“心同山河”巨匾，气势磅礴。中厅有一幅抱柱对，蓝底金字，富丽堂皇，上联书“入则孝，出则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后学”；下联“诵其诗，读其书，友天下之士，尚论古人”，是清初著名学者，亭林先生生前好友朱彝尊所作，该联原在玉山书院顾亭林祠堂里，早已不存，后由著名书画家钱君匋重写，用隶书参汉简体。另一幅抱柱对在前厅，白底黑字，朴素大方，上联写“困学昔惟王伯厚”，下联为“日知近有顾亭林”。原作者清末学者王懿荣，字廉生，山东福山人，工行楷书，专精金石训诂之学，他是甲骨文的发现者。这副对联为行楷。最后一幅是挂在正厅后墙上的“板对”，青漆底嵌石绿，显得十分古雅，上联书“继往圣绝学”，下联写“辟万世太平”，这幅对联取宋代哲学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意，系复旦大学王蘧常教授所书。王教授一生研究亭林之学，著有《顾亭林诗集汇注》，他的章草为当代一绝，有“今日王羲之”之誉，手书此对已经九十一岁高龄了。正厅左右墙壁上嵌有大型砖刻画像，形象地介绍了亭林的生平事迹。

纪念馆正厅左右两室设陈列橱，右室为亭林生平与事迹介绍，陈列橱柜里展示着有关图片、亭林遗履的复制品和亭林著作各种版本等。左室为后世纪念亭林题词、书画、电视剧《顾炎武》剧照等。正厅靠后墙的两侧橱内还陈列各种有关的资料。

第四节 遗址、遗迹

南宅 现在千灯镇南大街蒋泾桥南。顾氏宅第，有南宅、北宅之分，南宅是亭林亲生父母的老家，北宅是他过继嗣祖家。南宅从南大桥至蒋泾湾，内分三小宅，人称南墙门、中墙门和北墙门，都沿街而建。亭林亲生父母居住在中墙门内，大门有“亭林世泽”砖刻门楼共三进，第一进门房，第二进客厅，第三进内堂。南宅屡经沧桑，现已不存。现在的顾亭林故居，是1998年在南宅的原址上重建的。

北宅 北宅规模较南宅大，从木花浜到中木桥一带都

是，为亭林嗣祖顾绍带的宅第。北宅共有五进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河埠和水墙门为第一进；石板街道以西为第二部分，由第二进靠街楼、第三进正厅、第四进堂楼组成，这三进有走马楼相连接；第三部分由后花园和第五进读书楼组成。读书楼是亭林从小读书的地方，人称“庠楼”。可惜现在都被拆除。

遗清堂 在昆山城内柴王弄。为亭林本生祖顾绍芳所建，后由亭林亲生父顾同应继承居住，据说是亭林的出生地。后亭林到县城入泮，曾长期居住在此。

顾庐 在陕西华阴县岳庙乡庙前村。亭林六十五岁第二次到华阴，居住在王山史家中明善堂内；后王山史为亭林构屋数楹，名为“顾庐”，亭林在此定居数年。

朱子祠 位于陕西华阴县华山云台观西。因为南宋时期云台观曾经奉祀过朱熹，亭林与王山史同游华山，提议在此地新建朱子祠堂并兼营书院。华阴县令迟某，捐资百金，亭林也出资四十金。于1681年农历七月初十开工，中秋节之后祠堂的主体结构基本完工，第二年正月建成。亭林有《华阴县朱子祠堂上梁文》。

绛山书院 位于山西曲沃县招待所之东，原址座落在曲沃县医院的西部。绛山书院原名乐昌书院，是闻名三晋的书院，殿宇古朴，有文昌阁轩昂突兀。因著名学者卫蒿（号绛山）在此讲学更名为绛山书院。亭林晚年栖身于书院，并应邀在此讲学。

宜园 位于曲沃县城西南三里的韩村。园址在曲沃古城之内，南临浍水，与曲沃十景之一的绛山冰岩遥遥相对。园内廊舍清洁，环境优美，随处可见奇花异草，使人赏心悦目。亭林初到曲沃栖于绛山书院，因城内嘈杂，后徙居宜园。宜园主人韩宣，字旬公，别号宜园主人，清初进士。当地有传说，亭林就住在宜园内的“白石楼”中。1682年农历正月初八，亭林失足坠马，于次日凌晨歿于宜园，宜园主人亲为殓柩治丧。

第五节 遗物、手稿

一、遗物

遗履 现藏南京博物院。该履长九寸三分，为秋香色缎子面，玄色滚边，白厚底。从亭林遗履尺寸看，亭林脚码较大，可以推测他的身材较高。

笔筒、砚台 收藏者为山西曲沃韩氏后裔韩春华。1986年韩春华在搬家时，发现了一个笔筒和一方砚台，据说这两件珍贵的传世文物是当时顾亭林使用过的。笔筒系竹制，高24厘米，直径28厘米；砚台为椭圆形，嵌放在一个精致的木盒里。

书法 有“鹤从珠树舞，凤向玉阶飞”对联拓片。现藏于昆山市文物管理所。

绘画 万寿祺赠亭林的《秋江别思图》。现藏于浙江博物馆。

二、《天下郡国利病书》手稿

顾亭林去世之后，其著作、手稿及藏书大多被外甥徐乾学、徐元文从嗣子顾衍生手中强取过去。后徐乾学被贬回乡，把这些书籍稿本带回了昆山，并收藏在他家的藏书楼“传是楼”中。这里就《天下郡国利病书》稿本的流传情况作一简述。

其一，关于手稿的真实性。一开始，大多数学者认为手稿全都出自亭林的手迹，后经清代大学者钱大昕反复鉴定，得出结论：该手稿正文是亭林的门生眷写或者是请人代为抄写的，而书中用朱笔校正修改的地方则为亭林亲笔所书。民国时期，昆山图书馆馆长王颂文研究更为具体，他认为：此稿首册书“崇祯十二年己卯纂辑”，正文凡是书“某省、某府”，或书“备录”二字，皆先生手迹。全书三千另六十三叶，大多经朱墨校点，有旁注，有增辑，蝇头细楷，先生亲手校注的近三百叶。序文也是先生亲笔，但是纪年“壬寅七月望日”的上方有“康熙元年”四字，墨迹行间欹斜，疑后人添注。由于该稿本流传已有三百余年历史，十分珍贵，已正式列入了中国善本书目录。

其二，流传经过。手稿最初为藏于徐氏传是楼中，因此世称“传是楼本”。后来亭林嗣子顾衍生想讨还嗣父遗稿，竟遭徐氏拒绝。但没过多少年，显赫一时的徐家在了

政治角逐中失败了，亭林部分遗著又回到了顾衍生手中。后来，亭林的藏书、遗著渐渐散失，该手稿后归王氏所有。昆山藏书家张秋塘又从王莲泾手中得到了这部手稿。1765年，著名藏书家吴县人黄丕烈在张秋塘那里见到了这份手稿，他非常想得到此书，没有成功；后来再问起此书时张秋塘告诉他，手稿已为蒋春皋收藏，黄丕烈十分后悔当初没有下决心买下来。1792年春，有个叫“五柳居”书友邓氏携书来访黄丕烈，黄氏一见原来就是《天下郡国利病书》手稿，想起数十年前失之交臂，如今又失而复得，且惊且喜，当下以白镪数十金买下。之后，手稿为晚清湖南巡抚苏州人吴大澂所得。光绪之季，昆山方还与王颂文在吴大澂的儿子吴讷士家中见到了此手稿。1909年，清廷允准亭林从祀孔庙，昆山举行从祀典礼，方还再次到苏州会晤吴讷士，说明家乡人民渴望求得此书的迫切心情，讷士慨然允诺。方还等送去200块银元（相当于吴氏得书原价），奉书回昆，将此书收藏在亭林祠堂，从此一代文献，归家乡保存。

其三，手稿的保护。1925年，琅环里昆山县图书馆新楼建成，该书移藏于图书馆藏书楼，后存放于昆山银行。以后因连年战事，为防止散失，原稿连同亭林遗履，一度转移到上海金城银行保险库。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王颂文将该书取回，连同昆山图书馆的其它历代珍贵版本，一并移往陈墓（今锦溪镇）陆缉安家保藏，几遭不

测，抗战胜利，又运回昆山。以下，摘录1946年5月20日，昆山《旦报》一篇通讯中陆氏后裔的回忆：

廿六年深秋，国军西移，各地避居陈墓者，纷纷随军撤。昆山王沂仲（颂文）先生亦避居陈地，于临行时，与先严缉安公洽商，将昆山县立图书馆书籍二木箱寄与我家，当时并未言明内有珍本。先严受人付托之重，必须负责珍藏，乃妥藏在高燥秘密之处。嗣后，敌伪盘踞我镇，曾数次搜索，且探悉内有顾先贤手著珍本，覬觐益切，幸经储藏周密，终未被劫。迨至卅一年春，敌伪大举清乡，四出骚扰，且强住民房，舍间被敌宪数度借宿，几经检查，幸均未为所获。后陈群为伪江苏省长时，昆山伪官伪员，竟欲将此一代文献，献媚陈逆，并派员来镇查询。抗战胜利后，将此二木箱珍本，送至昆山县政府……此一代文献，合浦珠还，卒不负昆邑父老之热切期望，更有慰先严暨沂仲先生一片苦衷，聊尽保管责任，深为一代文献庆。

解放后，手稿由昆山县人民政府接管。以后，由江苏省人民政府责成南京图书馆保藏。

其四，手稿的出版。清代嘉庆年间，四川龙万育根据当时通行的一百二十卷传抄本出版了此书，但是通行本在篇目、编次上与手稿有根本不同，且质量不高。1933年，昆山县县长彭百川、图书馆馆长王颂文、教育局局长潘鸣凤与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纂张元济先生商定影印出版这一手稿，商务印书馆编校昆山人胡文楷、孙义力等极力促成了

其事。影印本全书分为五十册，列为《四部丛刊》三编。2002年11月，昆山市顾炎武研究会化了四年时间进行点校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标点本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全书一函精装六册，基本保持了原稿本的结构，并采取横排、用简体字，很便于广大读者阅读。

参 考 书 目

- 《顾亭林诗文集》 华忱之点校 中华书局
- 《日知录》 顾炎武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 《音学五书》 顾炎武著 中华书局
- 《天下郡国利病书》 顾炎武著 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
- 《顾亭林诗笺释》 王冀民撰 中华书局
- 《顾炎武文》 唐敬杲选注 商务印书馆
- 《顾炎武文选》 钱仲联主编 张兵选注 苏州大学出版社
- 《清顾亭林先生炎武年谱》 张穆编 台湾商务印书馆
- 《汉学师承记》 江藩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 《顾宁人学谱》 谢国桢著 台湾商务印书馆
- 《顾亭林学记》 张舜徽著 中华书局
- 《顾炎武年谱》 周可真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 《顾亭林生活》 郑行巽著 世界书局
- 《明末三大思想家》 杨廷福著 四联出版社
- 《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 郑万耕著 新华出版社
- 《祖国十二大诗人》 清华大学中国语文系 开明书店
- 《顾亭林与王山史》 赵俪生著 齐鲁书社
- 《顾炎武》 张岂之著 中华书局

《顾炎武》 沈嘉荣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 侯外庐著 人民出版社

《中国哲学史稿》 孙叔平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顾炎武学术思想研究汇编》 存萃学社 香港大东图书公司

《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 周可真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 游国恩等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清诗史》 朱则杰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 谢正光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山西地方史研究》 山西师范学院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编印

《昆山文史》 昆山市政协文史办编印

《会内通讯》 昆山市顾炎武研究会编印